



大会

Distr.: General
2 July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30

调查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
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

2015 年 7 月 2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大会关于调查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的第 69/246 号决议。按照该决议第 1 段，我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任命了独立专家组，负责审查和评估与前秘书长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相关新信息的证明价值。我在本信中将根据第 69/246 号决议第 3 段的要求报告取得的进展。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小组组长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穆罕默德·尚德·奥斯曼以及小组其他成员，澳大利亚的克里·麦考利和丹麦的亨里克·拉森，感谢他们为寻求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事件真相而做出的出色贡献。小组报告是我们履行职责在事发多年之后确定真相的必不可少的步骤。谨随函附上专家组的报告以及小组组长的送文函。我将会公开本信、小组组长的信、小组报告及其附录，但需做一些小的修改，以保护受害者的个人医疗信息和接受小组访谈的目击证人的隐私。

我谨简要说明小组报告的显著特点及其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按照其任务规定，小组审查并概述向其提供的新信息，评估其证明价值。我感到高兴的是，小组不仅确定新的信息是否具有证明价值，而且还分四个类别来确定这些证明价值的重要性：无、弱、中、强。我经过思考认为，这个分类提供了一个依据，可以据此区分需要进一步探究以寻求真相的新信息和无此价值的新信息。

我感谢小组组长和小组成员前往赞比亚的卢萨卡和恩多拉。我还要感谢 12 位接受访谈的幸存目击者，他们慷慨地分享他们的时间和对 SE-BDY 飞行最后时刻的记忆。在我 2014 年 3 月 21 日说明(A/68/800)附件所载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报

* A/70/50。



告中传达的信息给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它证明了小组尽职尽责，尽了最大努力，该小组寻求并成功获得来自有关国家和私人档案和其他重要来源，包括前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成员以及各种研究人员和技术专家。我还欢迎小组积极主动，争取所有会员国的帮助，并锲而不舍的追踪某些会员国，要求获得更具体资料。这些会员国可能有相关记录或掌握其他相关资料。这不仅有助于将小组的努力重点放在那些其存在似乎可以因向其提供的新资料而得到证实，而且还有助于缩小可能原因的范围，而其合理性被小组认为是有充分的证明价值的。

我感谢会员国努力配合专家组的工作，感谢有关会员国愿意为专家组负责人和(或)成员提供或准备新资料。但是我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会员国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回应、完全没有回应，或者不顾时间的流逝，仍然维持有关文件的机密状态。我计划与有关会员国跟进此事。专家组在报告中还提到，“尽管专家组向某些会员国提交了其他具体的资料请求，但那些作出回应的会员国称，他们无法找到与请求有关的任何文件”。专家组在结论中明确指出，“专家组认为，这条调查线还没有完全失去价值”。我的理解是，这意味着仍然可能得到与 SE-BDY 号坠机有关的未公开机密材料。就此，我敦促有关会员国继续寻找有关文件和资料，尽快对具体资料的未决请求作出回应。

关于专家组对所得新资料证明价值的考察和评估，我注意到，与死亡原因有关的新资料似乎可以支持 1961 年 SE-BDY 号乘客原始验尸检查的适当性、检查结果和结论。这似乎可以确认，SE-BDY 号机上的 15 名乘客死于飞机坠毁造成的多处负伤或推测造成的多处负伤，另 16 名乘客死于类似原因，尽管是在 5 天之后。与死亡原因有关的其他新资料缺乏证明价值，这实际上排除了达格·哈马舍尔德在从坠机中幸存后被刺杀的说法。

同样，在没有任何其他新资料的情况下，专家组对将阴谋或劫机作为可能坠机原因的新资料的评估体现，这两种假设似乎也不成立。专家组还发现，“雇佣兵、其对话者或代理人声称他们在空袭中击中 SE-BDY 号或使其迫降”的说法并不可信。最后，我注意到，虽然专家组没有收到与驾驶错误具体相关的任何新资料，但专家组指出这“并不妨碍有关这一坠机原因假设的现有资料的证明价值”。

下列新资料涉及将空袭或其他干扰作为可能坠机原因的假设。专家组认为，这些资料具有中等的证明价值：

(a) 9 名新目击者称，他们在 SE-BDY 号接近恩多拉市时发现空中不只有一架飞机，且其他飞机为喷气式飞机，或者 SE-BDY 号在触地前起火，或被现场的其他飞机射击或紧追；

(b) 两人声称，他们听到了据称被截获的情报，涉及 SE-BDY 号可能受到空袭或陆地袭击，或读到了无线电广播被截获信息的副本；

(c) 出现了有关加丹加省政府 1961 年时空中能力、使用外国军事人员和准军事人员情况的新资料；

(d) 哈马舍尔德先生用 CX-52 密码机发出的信息可能被截获；

(e) 在对可能坠机原因的一个或多个假设中，机务人员疲劳可能是造成 SE-BDY 号坠毁的一个因素；

(f) 出现了其他信息，使关于坠机地点发现时间的官方说法、多名官员和地方当局的行为受到质疑。

因此，专家组最终发现了有重大意义的新信息，认为这些信息有充分的证明价值，可以继续将空袭和其他干扰作为可能坠机原因的假设之一。特别是，专家组明确推断，如上文(a)至(c)段所述，新目击者的证词、据称截获的有关情报、有关加丹加部队空中能力的新信息“可能也提供了相当的线索，以供查明真相，找到造成坠机和死亡悲剧的可能原因”。

我认为，为了最终查明真相，有必要开展进一步质询或调查。但是，为了便于质询或调查得到最终结果，查明 1961 年 9 月 17 日和 18 日悲剧事件的真相，专家组向有关会员国要求的具体信息将大有帮助。因此，我再次敦促会员国披露他们可能持有的造成 SE-BDY 号乘客死亡的情况和条件的有关信息，取消此类信息的机密等级，或准许获得此类信息的特权，特别是专家组评定具有中等证明价值的新信息。

为此，我请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与有关会员国接触，跟进专家组具体信息请求尚未得到回应的方面，收取并评估会员国或其他来源提供的任何其他新资料，对其进行“重点突出、协调一致的审查”，确定这是否会改变我们目前持有信息的证明价值。法律顾问还将向我提出建议，说明需要大会注意或采取行动的事态发展。我将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结束之前向大会报告任何进一步进展。

在这方面，专家组建议与各类国家档案和私人持有的档案保持联系。根据这一建议，我还请法律顾问探索“是否存在可行性，建立中央档案存储或其他整体安排，使联合国和任何其他经授权的方面能够以电子方式或其他适当的途径查看这些记录和档案，以确保能持续、更好地查看这些记录和档案，使其得到更好的保管。”

总之，我们必须谨记专家组组长在 2015 年 6 月 11 日送文函中所说的话。他在信中说，“要最终揭示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全部真实情况与环境，还需联合国锲而不舍、高度重视，继续填补尚存的关键性资料空白，包括由会员国及其机构掌握的、也许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这个死亡事件及其可能原因的保密材料和资料。”

因此，查找造成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悲剧死亡条件和情况的全部真相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为此，我建议大会继续审议这一事项。这可能是我们找到真相的最后机会。在我们重申对此的承诺之际，我吁请大会在继第 69/246 号决议第 2 段之后，再次向会员国提出这一要求，确保在事件发生 50 多年后仍处于机密状态的有关记录得以公开，或者提供给联合国秘书处以及大会可能希望委以此任务的其他杰出人士查阅。

我认为这是我们对我的杰出、卓越的前任——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和家人的庄严责任。

潘基文(签名)

送文函

2015 年 6 月 11 日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设立的独立专家小组组长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作为独立专家小组组长并代表小组成员 **Kerryn Macaulay** 女士和 **Henrik Larsen** 先生提交小组报告，说明我们对有关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事件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的检查和评估，并说明我们的重要发现、结论和建议。

阁下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的要求任命我们组成这个小组，我们深感荣幸。在执行任务时，我们始终牢记，在寻找导致前秘书长及其随行人员丧生的真正情况和环境方面，这项决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遵照阁下发布的职权范围，小组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启动工作，在随后的时间里，查阅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资料以及由会员国和别的资料来源获得的其他信息。我们前往赞比亚，约谈了新的证人，并前往比利时、瑞典和联合王国，查阅了种种政府和非政府档案。我们还向所有会员国积极征集资料，并向某些会员国发出了专门的资料请求。

在上述任务和活动基础上，小组收到了大量新的资料，补充了秘书长从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收到的资料。我们对小组掌握的所有新资料进行了审查和概括，经过评估认为，其中部分资料具有证明价值。小组还根据新资料的相关性、真实性、可信性和/或可靠性，同时牢记每一条资料与全部资料之间的关系，评估了每条新资料的证明价值高低，将其分为无、弱、中、强四等。

小组的最重要结论是，要最终揭示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全部真实情况与环境，还需联合国锲而不舍、高度重视，继续填补尚存的关键性资料空白，包括由会员国及其机构掌握的、也许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这个死亡事件及其可能原因的保密材料和资料。

在不妨碍阁下作为秘书长的特权、不妨碍大会的最终决定的前提下，小组还就下列几方面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供阁下考虑：档案的整体保存；阁下继续努力从有关会员国获取保密记录或文件；如何处理本小组任务结束后收到的所有新资料。

协助阁下从事这一重大任务是我们的殊荣。我们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还非常感谢法律事务厅，特别是主管法律事务助理秘书长 **Stephen Mathias** 先生和高级法律干事 **Mona Khalil** 女士的协助。我们尤其感谢来自秘书处的下列人员的出色协助：担任小组秘书的 **Matthew Willis** 先生、担任小组助理的 **Leslyn Raphael** 女士、联合国驻赞比亚驻地协调员 **Janet Rogan** 女士以及联合国驻赞比亚国家工作队。

在此，我们还要对会员国的建设性合作正式表示深深的谢意，并希望它们继续努力，按照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的规定，提供涉及前秘书长及其随行人员遇难事件的文件及其他材料。

我们感谢证人们体贴拨冗，向我们追述往昔的事件。

我们感谢许多专家和专业人士无偿花费时间，为小组提供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我们还必须感谢苏珊·威廉姆斯博士及哈马舍尔德委员会付出努力，使这个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最后，我们向飞机失事罹难者的亲属表示深深的敬意。关于那厄运降临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真相。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有助于真相大白。

独立专家小组组长

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签名)

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所设独立专家小组(达格·哈马舍尔德小组)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8
二. 关于死亡原因的新资料	11
三. SE-BDY 号飞机最后时刻目击证人提供的新资料	17
四. 与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部威胁有关的新资料	21
五. 关于人为破坏假说的新资料	40
六. 关于劫机的新资料	45
七. 有关人为因素的新资料	46
八. 与官员和地方当局的活动有关的新资料	49
九. 主要结果摘要和结论	54
十. 建议	59
附件	
附录 1. 小组请所有会员国提供一般性资料的信	61
附录 2. 小组请比利时政府提供特定资料的信和后者的答复	62
附录 3. 小组请法国政府提供特定资料的信和后者的答复	66
附录 4. 小组请德国政府提供特定资料的信和后者的答复	70
附录 5. 小组请南非共和国政府提供特定资料的信和后者的答复	73
附录 6. 小组请美国政府提供特定资料的信和后者的答复	75
附录 7. 小组请联合王国政府提供特定资料的信和后者的答复	84

* 本报告在印发时未经正式编辑。

一. 导言

背景

1. 秘书长在收到调查达格·哈马舍尔德罹难原因法学家委员会(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之后,于2014年3月21日将该报告提交大会,并附上一份说明,表示他的评估意见是,该报告含有与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有关的新证据(见 [A/68/800](#) 和 [A/68/800/Add.1](#))。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是一个私人志愿机构,由四个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应一个授权委员会的邀请组成,主要工作是检查现有证据,并提交报告,说明据他们认为,这些证据是否使联合国有理由重新启动调查。

2. 大会在其2014年12月29日第69/246号决议中确认收到该报告,考虑了秘书长的评估意见,然后请秘书长任命一个独立专家小组,以审查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大会在该决议中鼓励会员国公布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并向秘书长提供有关这次死难事件的相关资料。2015年3月16日,秘书长依照该决议宣布任命独立专家小组(小组),其任务是检查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有关的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他任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Mohamed Chande Othman 担任小组组长,并任命飞行安全专家 Kerryn Macaulay(澳大利亚)和弹道学专家 Henrik Larsen(丹麦)为小组成员。小组从2015年3月30日至6月12日进行了工作。本报告概括了小组收到的新资料,评估了这些资料的证明价值,并提出了小组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以前的历次正式调查

3. 1961年9月19日至11月2日,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政府的民用航空局调查委员会(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最先调查了本小组的任务所涉事件。这次调查之后,根据1955年《联邦调查委员会法》成立了一个联邦调查委员会(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其报告于1962年2月19日公开发表。此后,大会依照其1961年10月26日第1628号决议成立了一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联合国委员会),调查导致这次死难事件的情况和环境。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A/5069](#))发表后,大会在其1962年10月26日第1759号决议中注意到该报告,并请秘书长向其通报他可能注意到的任何新证据。

任务和定义

4. 根据大会第69/246号决议和秘书长发布的职权范围,小组的任务是检查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有关的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具体而言,小组的任务是:审查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和源材料、会员国公布的任何有关记录、或是会员国或其他来源可能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约谈证人、提供了新资料的其他人士以及能够鉴定这些资料或是解释其所

涉技术性问题的专家；在必要时和适当情况下前往坠机现场；编写一份关于其调查结果的报告，并在其中列入小组约谈的证人提供的新陈述以及会员国或其他来源提供的任何新记录或新资料。

5. 关于评估工作的范围，小组将“新”资料定义为：与这次死难事件有关，由于内容或出现时间，联合国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无法看到的资料以及该委员会当时可以看到，但由于新材料、科技发展或最佳做法的出现，现在能够从新的角度加以审视的资料。

6. 小组为了其评估工作的目的，将“证明价值”定义为：(新)资料独自或是与其他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趋向于证明或否定存在或不存在某件或某些事实，涉及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为了进行这样的评估，小组根据以下一项或多项标准(并非全部标准)对单项或多项具体资料进行了考量：资料的真实性(包括前后一致性和当时性)、资料类型(例如主要资料、次要资料、传闻或间接资料)、资料的可信度(包括与其他资料或已核实情况的一致性)、专家技术评估结论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他材料的支持。

7. 为了评估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小组把价值分为四类：无、弱、中、强。定为哪个类别取决于新资料的性质、内容、来源和广泛性。须注意的是，虽然一项新资料可能被评估为“弱”，因此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协助其证明存在或不存在一项或多项事实，但小组仍将其和关于所涉问题的全部资料放在一起审视和评估。在这方面，对一项或多项资料的证明价值的评估结论不一定一成不变，会根据以后新出现的新资料而变化。

8. 小组的任务不包括进行调查或得出任何法律结论。

方法和活动

9. 小组把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进行一次案头分析，对象是与导致这次死难事件的情况和环境有关的新、“老”资料，其中包括以下文件所载资料：以前的正式调查报告(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和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及源材料；联合国档案中的有关卷宗和记录；关于 1960 年代初刚果国内和周边各种事件的背景资料。此外，小组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其中鼓励会员国公布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并向秘书长提供有关这次死难事件的资料，于 4 月 8 日向所有会员国发出一一般性请求，请它们向小组提供任何这样的记录或资料(见附录 1)。

10. 在这个阶段，为了有助于随后评估收到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小组还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向比利时、法国、德国、南非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发出较为具体的资料请求(见附录 2 至 7)。此外，小组还尽可能与这些会员国的代表会晤，解释提出的请求。小组在工作中还与瑞典政府进行了大量互动。

11. 在第二阶段，小组成员于 4 月 28 日至 5 月 10 日前往若干地点，收集和审查与评估工作有关的资料。这些旅行包括：前往伦敦，会晤前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主席 Stephen Sedley 勋爵；前往牛津，检查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前总理 Roy Welensky 的文件；前往卢萨卡和恩多拉，约谈 SE-BDY 号飞机最后时刻的目击证人；前往布鲁塞尔，检查比利时国家档案馆所藏材料；前往斯德哥尔摩，检查瑞典国家档案馆和瑞典皇家图书馆中的材料，并会晤前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成员 Hans Correl 以及瑞典志愿调研人员 Goran Björkdahl 和 Hans Kristian Simensen。小组认为，它分别向法国、德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发出的提供特定资料的请求，再加上它向其征求过意见的其他人士进行的调研，足以代替对这些国家的档案馆所藏材料进行的查询和检查。

12. 在同一阶段，小组在纽约会晤了前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成员 Richard Goldstone 以及联合王国学者和历史学家 Susan Williams 博士，后者的著作“Who Killed Hammarskjöld?: The UN, the Cold War and White Supremacy in Africa (2012)促成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成立，并成为该委员会的材料来源之一。

13. 在第三阶段，小组对新资料进行了概括，评估了这些资料的证明价值，并起草了一份调查结果报告。该报告的一项是专家提供的技术评估报告摘录。小组在这方面收到下列人士提供的法医学资料专家评估报告：南丹麦大学法医病理学研究所副首席法证病理学家 Peter Juel Thiiis Knudsen 教授；安大略省首席法证病理学家、多伦多大学检验医学和病理学教授 Michael S. Pollanen；邓迪大学法证和法医中心主任 Stewart Fleming 教授。关于弹道学资料，小组收到下列方面提供的评估报告：丹麦全国法证事务中心侦探督察兼枪支检验员 Egon Poulsen；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该机构进而征求了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NTSB)的意见。

报告的结构

14. 本报告翔实地概括了向其提供的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有关的新资料。此外，本报告阐明了小组对这些新资料的证明价值的评估意见。

15. 更为具体地说，第一节概括和评估了与这次死难事件的原因有关的新资料，将其分为以下两类：飞机坠毁造成的多处创伤或假设多处创伤所导致的死亡；据称是某个或某些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报告然后探讨和评估了 SE-BDY 号飞机最后时刻的目击证人提供的新资料，尤其是关于可能发生外部干扰，导致坠机的新资料。接下来，报告概括和评估了与 SE-BDY 的四个假设坠毁原因有关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这四个假设原因是：飞行员失误、外来袭击或威胁、破坏和劫机。小组没有收到任何其本身显示飞行员失误，或联合国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述“人的过失”，可能是坠机原因的新资料。这并不减损与假设坠机原因有关的现有资料的证明价值。下一节概括和评估了与人的因素在坠机事件中的可能作用有关，

而且对各种假设坠机原因具有证明价值的新资料。本报告的倒数第二节检查和评估了关于官员和地方当局所进行活动的新资料。最后一节总结了小组的全部调查结果，并提出了结论和建议。

16. 小组指出，它认为，为了使报告的结构与历次正式调查和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保持一致，并确保本报告的连贯紧凑，有必要围绕以前历次调查报告所讨论，而且就此向小组提供了新资料的有关飞机坠毁原因或可能原因的问题或专题组来组织新资料。这个办法是为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新资料的实质内容和意义，不应被理解为支持任何有关坠机或罹难原因的具体推测。

17. 小组还要指出，它在很短的任务期限内尽了最大努力，来对其收到的新资料进行尽可能准确和简洁的概括，这些新资料来自联合国秘书处(包括哈马舍尔德委员会送交秘书长的报告和源材料)、会员国、国家和私人档案以及各种其他来源提供的浩如烟海的资料。此外，小组还指出，它进行的概括反映的是所收到的资料。小组尽管没有足够时间，也没有足够资源来核实向其提供的资料在每个方面的真实性，但在评估这些资料的证明价值的时候，仍然尽量争取对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也进行评估。

二. 关于死亡原因的新资料

18. 自从联合国委员会于 1961 年结束工作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料，使人们尝试对罗得西亚当局通过尸检确定的机上人员的某些死亡原因提出疑问。此外还须注意死因与坠机之间的联系，即，死亡是在坠机时发生，还是在坠机后发生。在评估新资料的证明价值的时候，小组是围绕以下两类死因而组织材料：(a) 飞机坠毁造成的多处创伤或假设多处创伤所导致的死亡；(b) 据称是某个或某些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关于前者，北罗得西亚病理学家于 1962 年 9 月 21 日至 24 日根据《尸检条例》进行的尸检揭示，除了一名联合国警卫(AAA)之外，飞机上其余 15 人的死因是坠机导致的多处创伤或假设多处创伤。Harold Julien 警长于 1961 年 9 月 23 日去世，死因是坠机后的大面积烧伤导致的肾衰竭。

19. 应该把尸检报告与 H. Douglas Ross 大夫、P.J. Stevens 大夫和 J. Hillsdon Smith 大夫为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编写的报告放在一起阅读，后者题为《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泛航公司 DC6B 飞机空难事件的医学调查报告》。关于后一份报告，新资料中声称的一个死因是，哈马舍尔德在坠机后前额受到致命枪伤，新资料在另一处宣称，在一名随行瑞典士兵(BBB)的受到严重焚烧的尸体上，左腿有一处枪伤。

枪伤和其他创伤

20. 新资料宣称哈马舍尔德的尸体在前额上有一个圆孔，公开这一资料的是瑞典报纸 Aftenposten 于 2005 年 7 月 28 日发表的一篇采访。Bjorn Egge(退役)少将(已

故)是一名挪威军官,死难事件发生时部署在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并在坠机后立即由联合国专门派往恩多拉,找回哈马舍尔德的密码机和文件箱。他在采访中称,他在恩多拉医院查看哈马舍尔德的未烧焦的遗体时,在前额上发现一个圆孔。有人试图由此推断,前秘书长没有在坠机时丧生,也不是死于坠机,而是活了下来,但随后被枪杀。Egge 还根据 Bodil Katarina Naevdal 写的“Drommenes palass: Trygve Lie og Dag Hammarskjöld-en berating”(2000)一书中的资料宣称,有一张遗体照片上的这个圆孔经过了大量修描,以致看不出来。

21. 无论是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还是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都没有表示,它们在调查中是否知道或考虑了 Egge 宣称的情况。同样,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Egge 在哈马舍尔德前额上发现他所声称的情况后,当时或随后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联合国官员。

雇佣兵在地面刺杀

22. 上述情况与一些前雇佣兵宣称的更多情况相吻合,据称,这些雇佣兵曾经说过或者承认,飞机坠毁后,他们在坠机地点枪杀了哈马舍尔德或是其某些随行人员。Keith Howard Osmond 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披露的一个新情况是,1999 年 6 月,在一次约克公爵学校同年级校友团聚之后,他在联合王国 Taunton 市的假日旅店遇到同学 Colin John Cooper。后者向他坦白,坠机现场是伪造的,他和一个他称为 Swanepoel 的南非雇佣兵被派去确保哈马舍尔德在坠机时死亡。他还说,他和几个同事在听到飞机坠毁的消息后,跳上一辆路虎汽车,前往坠机地点,成为最先赶到那里的人。Swanepoel 说,哈马舍尔德和两个保镖没有在坠机时死亡,他声称枪杀了哈马舍尔德和另外两个幸存者。Swanepoel 和他的同事们随后显然对飞机残骸进行了扫射。据称,Cooper 也说,他为自己完成的任务所得到的酬劳,是装在可口可乐瓶子里的满满一瓶子钻石。

23. Cooper 于 2005 年 11 月在 Oppgard 市的法警办公室接受了询问,他说,他在加丹加申请成为一名雇佣兵,在伊丽莎白维尔的时候曾和一名有警察或军人背景的南非雇佣兵同住一个旅馆房间,后者名叫 Swanepoel。一天晚上,Swanepoel 喝醉了,情绪激动,吹嘘说自己在坠机后参加了刺杀哈马舍尔德的行动,枪杀了后者的保镖,该保镖在坠机中幸存,当时正挣扎着想逃开。他还说,飞机上的每个人,包括哈马舍尔德,都有很多处枪伤。提供给小组的资料显示,在坠机发生时期,估计有 500 名雇佣兵为加丹加当局服务。1961 年 9 月 17 日,在恩德拉机场也出现雇佣兵。

24.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向小组提供的材料载有一个名叫 John Benjamin Ebrnezar Swanepoel 的人提供的情况,这个人于 1962 年 12 月 26 日接受了一名联合国调查官员——A. Erikson 少校的询问。J.B.E. Swanepoel 告诉该调查人员,他是加丹加宪兵的雇员,于 1961 年 7 月中旬再度进入加丹加,逗留到 1961 年 10 月,此后

由于在狩猎时受伤，在 Kolwezi 住院。这份材料还包括一份证明，确认 J.B.E. Swanepoel 于 1963 年 3 月 21 日被联合国遣返，离开伊丽莎白维尔。小组无法根据收到的资料确定，J.B.E. Swanepoel 是不是 Colin John Cooper 或 Keith Howard Osmond 提到的同一个人。

25. 小组为了评估这些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寻求南非共和国政府提供协助，以确定和评估把 Swanepoel 牵涉在内的资料的真实性。小组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请南非主管当局查找并向小组提供他们可能掌握的任何与这一说法有关的资料，并查找和提供他们可能掌握的任何其他与存在某个或多个名叫 Swanepoel、于 1961 年在加丹加充当雇佣兵的南非人及其活动有关的资料(见附录 5)。在本报告编写时，小组尚未得到答复。

26. 虽然如此，小组认为声称名叫 Swanepoel 或 Cooper 的雇佣兵在坠机地点枪杀了哈马舍尔德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无”，依据是以下考虑因素：问题的根源在于 Osmond 和 Cooper 所说的情况相互矛盾，差异很大；他们对于一个名叫 Swanepoel(这在南非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 的雇佣兵的指认很不准确和含混；我们很快将在下文着重指出的尸检结果和结论，包括法证专家的意见。

哈马舍尔德：被发现时是否已经死亡

27. 2010 年 10 月，这次空难的一个目击证人，John Ngongo，向瑞典研究人员 Goran Björkdahl 提供了一份陈述，其中说，坠机当晚，他与一个现已去世的同伴正在灌木林中学着烧炭。他回顾说，飞机在距离他们底身处 300 米的地方坠毁。大约在天亮的时候，他们前往坠机地点，看见一个人靠在蚁丘上，双手枕在头后。这个人看来还活着，但奄奄一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创伤。

28. 一年多后，John Ngongo 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交给瑞典研究人员 H.K. Simensen 和 K.G. Hammer 一份陈述，在其中说，他看见的那个躺在那里的人已经死了。他随后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在对 Björkdahl 的陈述中说，飞机残骸与他所在位置的距离为 500 米，他发现的那个人已经死亡。而他在 2013 年 6 月 13 日给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另一份陈述中说，他发现的人是向后躺着，手在后面(枕在头后)，虽然有些距离，但他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

29. 虽然 Ngongo 当时在坠机地点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他最初宣称天亮时他在坠机地点看见的人还活着或奄奄一息的陈述，小组给予的证明价值是“无”，依据的考虑因素是：他是在坠机大约 5 个小时后，于 0500 时左右前往坠毁地点；第一次陈述与随后几次陈述在他发现的人是否还活着这一点上有重大矛盾之处；飞机残骸还在燃烧，随后发生爆炸，接近有危险；他当时不可能知道哈马舍尔德是谁；医学资料显示哈马舍尔德是在瞬间死亡。

一名士兵身上的枪伤

30. 在这次死难事件发生时，Adrian Eden Begg 在北罗得西亚警察部门担任助理督察，他在 2013 年 1 月 25 日告诉哈马舍尔德委员会，1961 年 9 月 19 日，他在坠机地点协助搜查残骸时，发现碎片下有一具瑞典士兵的遗体，他认为这是某个士兵(BBB)，于是拍了照片。这具尸体被严重焚烧，看上去在左大腿上有一处枪伤。飞机残骸附近有一支残缺的 9 毫米冲锋枪。他认为，腿上的伤口既有可能是爆炸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该名士兵携带的弹药走火造成。

31. Begg 还称，他在坠机地点为该士兵的遗体照了像。事实上，他拍照的是另一个坠机死难者(CCC)的遗体，这个人在左臂上佩戴着蓝白相间的联合国袖章，而不是瑞典士兵(BBB)的袖章。

32. 对 Begg 实际看见和拍照的人(即 CCC)进行的尸检指出，他的死因是坠毁造成的多处创伤。他的右大腿骨有一处骨折，右小腿“下半截的后部、中间和横向损失了非常大量的组织”，踝关节有一处骨折脱位。在左大腿中段外侧有一处很大的伤口，但大腿骨完好无损。

尸检

33. 小组在评估与死因有关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时注意到，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和联合国委员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尸检报告和 Ross 大夫、Stevens 大夫和 Smith 大夫编写的医学调查报告。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认为，哈马舍尔德被甩出飞机和火场，与机上的另外 8 个乘客在坠机时死亡。一些其他乘客(AAA 除外)虽然没有在坠机时死亡，但至少失去知觉，无法逃离。哈马舍尔德在瞬间死亡是罗得西亚委员会得出的调查结果。在两名瑞典士兵(DDD 和 BBB)的尸体上发现的弹头和其他发射物经调查认定，来自这些士兵携带的由于火烧而爆炸的弹药。弹道学检查还揭示，这些弹头都不是从“刻有膛线”的枪管中射出。联合国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34. Robert Ian Vanhegan 博士经过研究现有的医学资料，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向皇家病理学院(联合王国)研究员 Williams 博士提出了意见，在其中表示，对哈马舍尔德的 X 光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外来物，而诸如弹头这样的金属碎片都可以在 X 光检查中发现，而且，没有任何医学证据显示有头部贯通伤。Vanhegan 博士认为，在两名士兵(DDD 和 BBB)的组织内发现的弹头的走向显示，它们不是从枪里射出来的，也没有任何膛线痕迹。他的结论是，对所有人的尸检没有产生任何证据显示，有任何人遭到蓄意枪击，也不显示枪炮射击是坠机原因的一部分。

35.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还征求了三个著名病理学家的专家意见，他们是：Linköping 大学的 Lennart Rammer 教授、Uppsala 大学的 Christer Busch 教授和 Cardiff 大学的 Deryk James 博士。他们在 2013 年 7 月 24 日提交了联合意见，其中(经过研究现有的医学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但没有查看尸检 X 光片)得出的结

论是，尸检报告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哈马舍尔德受到枪击、在爆炸中受伤或遭受过烟熏。他们认为，尸检结果有力地显示，最重要的死因是胸部的“压碎伤”，包括肋骨、胸骨和胸椎多处骨折，血流入肋膜腔。这些创伤会造成胸壁不稳定(“连枷胸”)，导致呼吸衰竭。他们认为，这些创伤的外观强烈显示，它们是从飞机上甩出来时的减速力和身体随后落到地面上的冲击力造成。这些创伤还显示，哈马舍尔德在受伤时仍然活着。他们认为，虽然无法肯定地估计存活时间，但这段时间预计非常短暂，而且哈马舍尔德在着地后很可能由于头部受伤而失去知觉。

36. 考虑到以下因素，小组认为应该寻求三名独立的知名法证专家的意见：一些新资料中宣称的死因；这个问题与坠机之间的联系；Ross 大夫、Stevens 大夫和 Smith 大夫的最初尸检报告的适当性引起的疑问。

37. 南丹麦大学法医病理学研究所副首席法证病理学家 Peter Juel Thiis Knudsen 教授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很强的迹象，即使算不上证据，显示哈马舍尔德在遭受骨折的时候仍然活着；头部被枪击受伤，尤其是在飞机坠毁前受到枪伤的可能性极小。他认为，从创伤来看，哈马舍尔德在坠机后的存活时间不大可能超过几秒钟，最多如此，他在死后头部受枪伤的可能性也极小，与尸检结果不符。Knudsen 教授表示，关于头部受枪伤的怀疑纯粹是臆测，在尸检中找不到任何证据。但他在其意见的最后留有一点余地，表示虽然哈马舍尔德或其他丧生者的遗体上除了弹药爆炸造成的创伤之外，没有任何枪伤，但这并不排除飞机是被击落的可能性。

38. 安大略省首席法证病理学家、多伦多大学检验医学和病理学教授 Michael S. Pollanen 也认为，飞机上所有乘客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在坠机时或随后的大火中受到的创伤；没有任何医学证据显示，哈马舍尔德的头部有一处或多处枪伤，飞机上两名士兵的体内发现的金属碎片，包括弹头和弹壳碎片，可以归因于机上的弹药在坠机后由于高温而被引发，而不是来自枪伤。此外，他经过评估还认为，飞机乘客们是在坠机时受到创伤，他们受伤时还活着，是这些创伤导致他们丧生，因此，死亡不是发生在坠机之前。他还表示，尸检报告没有提供任何确定飞机坠毁原因的证据。他认为，挖掘哈马舍尔德或任何死者的遗体都没有任何医学或科学依据。Pollanen 同意 Ross 大夫、Stevens 大夫和 Smith 大夫的尸检结果和结论，这些结果和结论来自在坠机现场对尸体进行的病理检查、放射性检查、体外和体内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查(组织学和毒物学)。

39. 新资料，包括 Egge 提供的情况，还试图质疑尸检报告的适当性。Egge 宣称，当他在坠机发生后不久前往恩多拉医院时，尸检报告被从案件文件中抽出。小组认为，以下经过核查确实存在的资料否定了这一宣称具有任何证明价值的可能性：博德利图书馆所藏 Roy Welensky 的文件中的尸检记录；位于多伦多的安大略省首席法证病理学家办公室保存的 J. Hillsdon Smith 大夫的档案所载尸检记录；邓迪大学保存的 Hugh Douglass 大夫的记录。关于获取和查阅医学档案问题，小组赞

扬瑞典政府决定对瑞典国家档案馆所藏医学资料报告实行解密。同样，小组感激邓迪大学决定授权向小组公开和提供其档案中的医学记录，以供检查。

40. 邓迪大学法证和法医中心主任 **Stewart Fleming** 教授受小组委托，检查了该大学档案馆保存的 **Ross** 大夫的档案，发现以下两项主要法医证据：一整套原始 X 光片，其中包括所有 15 个坠机死难者的 200 张 X 光胶片和 **Julien** 军士的脚踝骨折 X 光片；一张大图，题为“1961 年 9 月 17/18 日联合国飞机恩多拉空难死难者病理检查结果分析”（下文简称“图解”），其中记录了病理学家对所有 16 个死难者的尸检结果所做说明，据信这些说明是与尸检报告同时编写。

41. **Fleming** 教授检查了主要证据，尤其是全部 200 张 X 光片，并根据其中显示的创伤核对了图解和医学调查报告中的记录，然后表示，病理学家们在尸检中对所有创伤的记录都是正确的。此外，关于哈马舍尔德，他认为 X 光片清楚显示了胸部创伤的严重性，这些创伤是胸部撞击伤造成的。根据这些结果和 **Ross** 大夫对死难者胸部、椎骨、颈部和头部进行的尸检描述，他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是胸部压碎伤造成的呼吸衰竭所致。他认为，坠机后的存活时间势必非常短暂，死难者由于医学调查报告中描述的头部创伤，几乎可以肯定失去了知觉。他经过研究哈马舍尔德的颅骨 X 光片，得出这一肯定的结论：与 **Egge** 的说法不同的是，哈马舍尔德的前额没有任何枪伤。

42. 医学调查报告确认，**Egge** 在恩多拉医院正式指认了哈马舍尔德的遗体。他的侄子努特·哈马舍尔德也查看了遗体。小组认为，**Egge** 宣称哈马舍尔德的前额有一处弹孔的说的证明价值是“无”，依据是以下考虑因素：有关资料；**Egge** 没有立即向据称派他前往恩多拉的联合国当局报告他声称于到达恩多拉医院后，在哈马舍尔德前额上发现的情况，也没有立即向他的挪威军队上级报告此事；在披露声称有这些情况的新资料方面出现的拖延；作为联合国委员会调查工作的一部分，瑞典皇家医学委员会征求了法证专家(**A. Frykholm** 博士和 **N. Ringertz** 博士)的意见，后者表示同意小组的意见；**Susan Williams** 博士、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本小组分别征求咨询的专家们所表示的意见，这些专家基本上同意，**Ross** 大夫、**Stevens** 大夫和 **Smith** 大夫编写的原始尸检报告是正确和适当的，并同意该报告的结论。

43. 而且，考虑到 **Begg** 在确认死难者身份时犯了错误，并认为他看见的遗体上有枪伤，与尸检报告不符，小组认为，他提供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无”。

44. 为了全面起见，可以补充这一点：虽然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小组分别征求咨询的法证专家大致上同意，**Ross** 大夫、**Stevens** 大夫和 **Smith** 大夫是在短暂的时间内进行的尸检，对某些创伤的外观、尺寸和位置的细节描述与按照现行法证标准进行的检查相比，没有那么详细，但他们也强调，这些尸检是高质量的，达到

专业水准，准确和全面地记录了可以在各自的 X 光片中发现的所有创伤，而且很可能符合当时的标准。

45. 关于 Egge 支持的另一说法，即，哈马舍尔德的一张照片经过了大量修描，以掩盖其前额上的一处枪伤，小组无法找到在坠机现场或恩德拉医院停尸房拍摄的哈马舍尔德前额或遗体的原始照片或底片，因此无法对这一宣称进行技术评估。此外，由于缺乏完备的身份资料，小组无法确定 *Aftenposten* 报纸文章所述学者的权威性和专长，而 Egge 的说法是以他们的意见为依据。查看过三张哈马舍尔德照片的 Vanhegan 博士表示，无法确定遗体在被发现时的姿势，也无法确定遗体距离飞机坠毁时的着地点有多远。小组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并考虑到声称发生的情况没有任何佐证，认为宣称哈马舍尔德的照片之一经过“大量改动”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弱”。

三. SE-BDY 号飞机最后时刻目击证人提供的新资料

46. 自从联合国委员会结束工作以来，总共有 12 名没有向该次调查或其他任何正式调查提供情况的 SE-BDY 最后时刻证人提供了陈述，说明自己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所见。这些陈述最先是私人和志愿研究人员通过约谈获得，随后是哈马舍尔德委员会于 2013 年 5 月通过约谈 7 名证人获得。尽管所有 12 名证人的陈述都交给了小组，但小组仍于 2015 年 5 月在赞比亚约谈了新证人当中的 6 名。小组没有约谈 12 名新证人当中的另外 6 名，原因包括：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因为健康原因无法接受约谈，或是以前提供的陈述完全是以传闻为依据。新证人为此前没有向联合国委员会或其他正式调查作证所提出的理由是：他们当时不知道正在寻找证人，或由于害怕遭到某种形式的反控而不情愿作证。

47. 在 12 名新证人当中，五名(Custon Chipoya、Kankasa、Mwebe、Ngongo 和 Ngulube)在陈述中提到，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他们当自认为看到一架大型飞机，据信是 SE-BDY，在恩多拉坠向地面时，在空中见到的飞机不止一架。证人当中的六个人(Custon Chipoya、Kankasa、E. Mulenga、S. Mulenga、Mwebe、Ngongo 和 Ngulube)宣称，该架大型飞机在落到地面之前已经起火。两个证人(Mwansa 和 Chimema)虽然距离坠机现场仅有两、三公里，但是说，他们没有看到第二架飞机(也没有看到第三架)，也没有看到他们在空中见到的那一架飞机有起火迹象。

48. 小组通过检查所有证人的陈述，包括那些于 1961 年和 1962 年在历次正式调查期间作证的证人的陈述，注意到新证人的陈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并不是全新的，因为若干在以前历次正式调查中作证的证人也报告说，当 SE-BDY 在恩多拉落向地面时，除了这架 DC6 型飞机，他们还在空中看到另外一架或多架飞机。这些证人当中还有一些人说，看到他们认为是 SE-BDY 的飞机在空中起火。尽管如此，

小组仍把新证人所提供陈述的内容视为新资料，因为这些陈述是来自联合国委员会及其以前历次正式调查都没有接触的新来源。

49. 此外，小组重新审视了罗得西亚委员会所谓的“非洲人”证人提供的陈述，因为小组经过评估认为，他们所提供的证词受到的对待不公平或是不一致，有时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视为不可靠，有时因为证人的民族主义或政治情感而受到极度怀疑，有时证人仅仅由于没有立即向当局报告自己看到的情况而被不予采信，尽管他们令人满意地解释了没有立即报告的理由。在这方面，小组同意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以下意见：联合国委员会尽管值得尊敬，但在挑选听证的证人方面显得保守，而且为此过于依赖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后者被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形容为“一个不那么可靠的前任”。小组因此认为，这些证人提供的情况是“老的”资料，为了进行小组的评估工作，现在可以从新的视角对其加以审视。

新证人看到的情况概述

50. 现将 SE-BDY 最后时刻的 12 个新目击证人所述看到的情况概括如下。这些资料来自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私人研究人员提供的陈述以及六个证人(Custon Chipoya、Kankasa、E. Mulenga、S. Mulenga、Mwebe 和 Ngulube)向小组本身提供的陈述。概述是围绕证人们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間观看所发生情况的位置来组织。

51. SE-BDY 最后时刻的四个新目击证人是烧炭人，出事当晚正在坠机现场附近的森林中照看炭窑。其中第一个证人(Ngongo)报告说，2000 时(当地时间)之后不久，他在空中看到一架大型飞机，而且还有第二架飞机靠近它飞行。他根据听到的声音，把第二架飞机形容为一架小型喷气式飞机。他回忆说，他看到大型飞机在坠毁前起火，引擎和机翼上的火尤其大。他说，听到第二架飞机在大型飞机坠毁后飞离该地区。这个证人声称在黎明时前往坠机现场。他在赶到之后看到附近没有任何人，飞机残骸仍在焚烧。他声称看见哈马舍尔德的遗体靠在一座蚁丘上。

52. 第二个新目击证人(Custon Chipoya)回忆说，他在午夜左右看到一架大型飞机在空中盘旋。该架飞机第三次盘旋时，他又看到一架小飞机，他根据其速度和听到的声音，将其形容为一架喷气式飞机。这名证人然后说，他看到有火从小飞机喷向大飞机。他听见一声巨响，大飞机随后起火，然后坠毁。这名证人声称在黎明时前往坠机现场，在那里看到警察和士兵。他报告说，很多死难者的遗体已经运走，其中包括哈马舍尔德的遗体，一部分飞机残骸也被运走。

53. 出事当晚第三个在森林中的新目击证人(Moses Chimema)回忆说，在 1900-2200 时之间的某个时间，他在空中看到一架大型飞机。他还回忆说，该架飞机在转身时机翼“碰到树木”，随即坠毁。这个证人在陈述中没有提到看见飞机在空中起火。他在 9 月 18 日 0900 时前往坠机现场，看见飞机仍在燃烧，当时有警察在场。

54. 当时在这个地点的第四个证人(Lumayi Chipoya)说, 她看见一家尾部冒烟的直升飞机在该地区上空盘旋了两、三次, 然后“掉了下去”。该证人回忆说, 她在坠机之后不久前往现场, 在那里看到警察和士兵。

55. 12 名新目击证人当中有两名(Kankasa 和 Margaret Ngulube)的位置在 Twapia(坠机现场东南 7 公里处), 位于准备在 10 号跑道降落的飞机的飞行路线下方, 该跑道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間は恩多拉机场使用的跑道。这两名证人当中的头一名(Kankasa)叙述说, 她的丈夫在 2100-2200 时之间的某个时间喊她赶快到房子外面来, 观看当时空中发生的情况。该证人说, 她出来后看见似乎是“两架军用飞机”从房子上方飞过, 飞往机场。她没有在空中看见大型飞机, 但看见远处坠机现场的方向有火光。她没有前往坠机现场。

56. 当时位置在 Twapia 的第二个新目击证人(Margaret Ngulube)回忆说, 1800-2100 时, 她在那一带看见两架飞机, 一大一小。她指出, 当她看见这两架飞机时, 它们都正从西飞往机场。小飞机超过大飞机后, 后者机翼起火, 随后“掉了下去”。该证人说, 她不能确定在大飞机消失之后, 小飞机飞向哪里。她没有前往坠机现场。

57. 新目击证人当中有三人当时的位置在 Chifubu(坠机现场东北 10 公里处, 恩多拉机场仪表起落跑道起飞段东北处 5 公里处)。其中第一个证人(Safeli Mulenga)在 2000-2100 时看见一架飞机“从刚果飞来”, 这架飞机比平常的飞机大。他看见这架飞机盘旋, 在盘旋到第三次的时候转向机场。该证人说, 飞机顶部, 而不是机翼, 随后起火。他说, 看上去火焰似乎“来自其他地方”, 像“闪电”一样。该证人在当晚没有看到空中还有任何其他飞机。他在坠机一、两天后前往现场, 在那里看到地上曾经有尸体的地方做着标记。

58. Chifubu 的第二个证人(Emma Mulenga)回忆说, 她在 1900-2000 时之间的某个时间看到一架飞机从西方飞来, 这架飞机在天上盘旋, 因此引起她的注意。盘旋到第三次的时候, 她看到一团火光像闪电一样从上面击中该架飞机。飞机顶部随后起火。火越烧越猛, 飞机从空中消失。该证人没有听到任何其他声音, 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飞机在附近。她没有前往坠机现场。

59. 这个地点的第三个证人(Dickson Mwebe)回忆说, 看到一架飞机从东飞往机场, 然后开始盘旋, 他估计当时的时间在 1900-2000 时之间。该架飞机盘旋到第二圈时, 出现了另一架较小的飞机。由于后者的速度和声音, 他将其形容为一架喷气式飞机。不久之后, 该证人看见一团火光从小飞机飞向大飞机, 击中后者机翼的顶部, 使其起火。小飞机随后离开该地区, 飞往西北方向。该证人在 9 月 18 日大约 0600 时或 0700 时前往坠机现场, 在那里看到警察和士兵。他注意到现场被红色的带子圈了起来, 一些树上也漆上了红色。一座蚁丘附近有一具尸体。

60. 当时在其他地点的三个新证人也提供了陈述。其中第一个人(Joseph Kalupentala)复述了 1987 年他当时的老板(Chikabouya)对他讲的一件事。这个老板说,他在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晩前往坠机现场时,被全副武装的“白人士兵”拘留,受到他们的威胁。该证人说自己当时是一个走私者。他说,他的老板还告诉他,这些士兵是比利时人,飞机是他们打下来的。

61. 这组目击证人当中的另一个(Douglas Mwansa)说,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里某个时间,他在 Kamensho Mpanshi(坠机现场西南 3 公里处)自己家中听到一架飞机从西方飞来。该架飞机在短暂飞离后,又从相反方向飞过来,随后他听到一声爆炸。该证人在听到爆炸后立即跑到外面,看见妻子指着坠机的方向。该证人没有提供任何更多关于飞机坠毁过程的情况,说自己的位置“距离坠机现场有些远”。他宣称在 9 月 18 日大约 0700 时前往现场,在那里看到警察。他还说,现场被圈了起来,尸体已经被运走。

62. 这组目击证人当中的第三个(Abraham Kunda)于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看到一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三次。他注意到,不久之后,机场灯光熄灭,整晚没有再开灯。大约在熄灯同时,该架飞机飞往恩多拉山(恩多拉机场以西 12 公里处)。该证人随后回到房子里,他的房子位于 Masala,据他说,这个地区与机场的距离为“200 至 300 码”。他在 9 月 18 日下午某个时间前往坠机现场,但没有提供任何与此有关的情况。

对新目击证人所做陈述的证明价值产生影响的因素

63. 重大事件,例如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发生的事件,会给目击者留下生动和持久的印象。目击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和由此而来的证明价值一般取决于若干变量,它们是:进行观察或予以确认的机会有多大;进行观察的条件和环境是否有利;时间流逝可能对人类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忆和回忆产生的影响。虽然证人关于他或她亲眼所见以及所做辨认或确认的叙述可能是诚实的,但必须根据上述因素来评估新证人所做陈述中的资料的证明价值。

64. 关于这些证人回忆看到或听到的各种事件的发生时间,他们的陈述在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现有资料之间差异很大,但小组在评估证明价值的时候并没有对其证词的这个方面给予很多重视。这样做的原因是,很多证人依靠的是不准确的计时办法,例如以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习惯为准,而不是依靠钟表。

65. 联合国委员会主要根据死难者的手表停摆的时间,确定坠机发生在午夜之后不久,当时月亮再过几分钟就会降到地平线之下。根据气象资料 and 多个证人所做陈述,当晚天气晴朗,几乎无风。尽管如此,小组仍考虑了这一可能性:距离坠机现场比他人远的证人在准确认定自己所说的某些细节方面,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相形之下,那些距离坠机现场较近的证人,尤其是那些在飞机坠落的森林地带照

看炭窑的证人，也许能够更清楚地听到和看到飞机坠毁过程的最后时刻，但由于周围森林树冠的遮挡和距离 SE-BDY 太近，可能看不到全景。

66. 小组经过评估认为，证人们看到的飞机数目不一样，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些证人的观察准确，另一些的不准确。他们于任何时候在该地区看到的飞机数目都会由于一些因素，例如他们观察连续事件的钟点和位置，而受到影响。此外，证人们虽然对飞机和飞行的具体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说，过去经常看到飞机在恩多拉机场里面和周围滑行和飞行。因此，一些证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当晚看到的任何飞机是否喷气式飞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67. 虽然由于前一段所说的那些因素，必须对目击证人提供的情况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但大多数证人提供的是他们真心认为自己亲眼看到的第一手情况，必须提供机会，根据现有的其他大量资料来验证他们观察到的具体方面的情况。

68. 此外，在一些情况中，根据上文所述标准对新目击证人就小组审议的不同问题或事件提供的所见情况进行了评估，因此，他们所提供资料在某些方面的证明价值经认定高于或低于同一些资料在其他方面的证明价值。

69. 小组回顾，其任务是检查和评估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有关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并注意到证人们所做陈述的内容，考虑了新证人提供的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确定以下事实：在 SE-BDY 接近恩多拉时，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空中除 SE-BDY 外的任何其他飞机是一架喷气式飞机；SE-BDY 在撞到地面之前已经起火；SE-BDY 是否遭到射击，或是否以其他方式遭到另外一架或多架飞机的进犯。在这些问题上，小组认定九个证人提供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中”，而另外三名证人(Lumayi Chipoya、Kalupentala 和 Kunda)宣称看到的情况或是与现有其他资料大相径庭，或几乎完全是以传闻为依据，因此证明价值是“无”。

70. 在本报告题为“与官员和地方当局的活动有关的新资料”的一节，小组将再次讨论这些证人提供的观察资料。

四. 与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部威胁有关的新资料

71. 1962 年的联合国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说，它“仔细检查了 SE-BDY 被另一架飞机或被地面袭击击落的可能性”。此外，该报告还考虑了“以下可能性：坠机是躲避行动所致，或是来自空中或地面的佯攻造成飞行员瞬间注意力分散所致”。该委员会在这方面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设”，尽管它无法排除发生了这种袭击的可能性。自那时以来，出现了一些与以下假设有关的新资料：另一架飞机击落了 SE-BDY，或以其他方式威胁该飞机，致使其坠毁。此外，小组还指出，联合国委员会曾获悉，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晚上和深夜，恩多拉地区没有雷达监测，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出现“不明飞机”的可能性。

侦听到的无线电通话之一

72. 新资料中包括前美国海军指挥官 Charles Southall 于 2009 年至 2013 年分几次场合向 Williams 博士和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所做陈述, 谈及他听到一段录音或看到一份无线电通话抄录, 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間声称发现并随后击落了一架飞机, 这架飞机据信是 SE-BDY。虽然他对这段通话的各次叙述在一些次要细节上略有出入, 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仍援引 Southall 的话说, 他听到或看到以下通话:

“我看见一架低飞的运输机。飞机上所有的灯都开着。我正对着它俯冲下去。是的, 这是泛航公司的 DC6 飞机。就是这架飞机。我击中它了。看见火光。这架飞机正在下落, 马上就要坠毁”。

73. Southall 还说, 在他注意到这段通话时, 他的通讯侦听官或另一个当时在场的军官告诉他, 这段通话来自一个绰号为“独行侠”的比利时飞行员, 他当时驾驶着一架加丹加军队使用的 Fouga Magister 型飞机, 而且“一定是在等待哈马舍尔德的飞机”。Southall 说, 他想不起来他当时是听的录音还是看的录音抄录。他回忆说, 根据“逐级上报因素”, 他是在实际通话发生大约 7 分钟后听到或看到资料的。他还说, 他不能确定这段资料是英语还是法语, 因为他的这两种语言都很流利。

74. Southall 说, 他听到这段录音时正驻扎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位于塞浦路斯尼科西亚(恩多拉以北大约 5 000 公里)的一个海军通讯设施。他把自己在这个通讯站的职位形容为“通讯处理和上报”官, 并说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共用该设施, 但两个机构的工作区是分开的。Southall 虽然通常仅在白天工作, 但是在这一天, 他的通讯侦听官在 1900-2100 时(塞浦路斯当地时间)之间的某个时候把电话打到他的住所, 敦促他在“大约午夜前后”到通讯设施来, “[因为]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Southall 正是在午夜刚过听到通讯站侦听到的通话。他说, 这段通话是中央情报局侦听到的, 然后转交至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区, 他当时正在这个工作区, 听到这段录音或看到录音抄录, 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四、五个人, 包括上述下级军官和他的朋友, Tyler Wat。

75. Southall 对当晚事件的回忆是在美国国务院的分析人员 Karen Engstrom 于 1992 年 12 月 8 日联系他时透露的, 后者当时应瑞典政府的请求, 协助该国调查哈马舍尔德是在何种情况下遇难。领导这次调查的是瑞典外交官 Bengt Rosio。

侦听到的无线电通话之二

76. 另一项性质相似的新资料来自前美国空军保密局军官 Paul Abram, 他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接受小组约谈, 表示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間, 他听到关于在刚果附近击落一架飞机的通话。Abram 当时隶属于希腊伊拉克利翁(恩多拉以北 5 000 多公里)的一个国家安全局监听站。他说, 监听站通常交给他五、六个频

率同时监听。他回忆说，“主要目标”包括刚果境内的军事活动，例如部队的移动和军火销售。Abram 宣称，在此前几天，监听站交给他 SE-BDY 的预计飞行计划，其中包括关于飞机类型和“飞机编号”的资料，并注明目的地为恩多拉。

77. 他根据在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接听到的“无线电杂乱通话”，认为自己正在监听“美国地面部队”的活动。在当晚夜深后的某个时候，他听到有人在无线电上说：“飞机过来了……机上的灯很亮”，随后有人在另一个频率上说：“美国人刚刚击落一架联合国飞机”，他根据口音，认为说话的不是美国人(但他后来补充说，也不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他说，这些通话之后，“无线电杂乱通话”大量增加。

78. Abram 并不认为他在所述期间听到任何来自 SE-BDY 的通话。他对听到通话的时间没有把握，但是说，他当时在监听站值夜班。他表示的看法是，联合国飞机是被地面炮火击落的，他认为这架飞机就是哈马舍尔德的座机。他认为使用了地面炮火的依据是，这些通话是在高频率(HF)无线电网络上听到的。

79. Abram 虽然说，他是监听站中唯一实时侦听到所述通话的军官，但是他立即把自己刚刚听到的通话告诉周围的人。Abram 宣称，监听站的其他军官随后收听了重放的通话录音，他们对其进行了处理，然后将其送交有关的收件人。Abram 在 2013 年写了本书，书名是“Trona Bloody Trona”，讲的是一次工会罢工的故事，书中泛泛地提到哈马舍尔德是在何种情况下死亡的，但没有详细说明他向小组宣称在出事当晚听到的情况。看来 Abram 是在他于 2014 年主动接触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时候首次提供更多的情况，但当时这个委员会已经结束工作。

真实性评估

80. 为了进一步探讨 Southall 所做陈述中的某些细节，并评估其回忆的清晰度和一致性，小组与他取得联系，请求进行一次约谈。他答复说，由于健康原因，无法答应这一请求。

81. 小组还请美国主管当局查找和向其提供他们可能掌握的任何以下方面的有关资料：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接听或收到的与一架飞机在北罗得西亚恩多拉的一个机场降落或接近该机场有关的录音或录音抄录；华盛顿特区可能在所涉时间前后与美国驻塞浦路斯和希腊大使馆分别进行的相关通讯的抄录(见附录 6)。小组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是因为看到国家安全局对哈马舍尔德委员会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根据《信息自由法》提交的请求作出的否定答复。国家安全局在答复中说，它所掌握的两份档案“符合”该委员会的请求(见 A/68/800，第 15.11 段)。国家安全局接着表示，不能公开这些档案，因为“可以合理地预计”，这样做“将极大损害国家安全”，而且对该机构的一项授权是，一旦确定“在这些文件中存在”“有关其活动的特定信息”，可对这些信息给予保护。

82. 此外，瑞典报纸 SvD Nyheter 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报道说，美国政府经过与瑞典政府非正式会谈，让当时的瑞典外交部长 Carl Bildt

看了这两份“符合请求”的档案。该文章引述 Bildt 的话说，这些档案中的资料无足轻重。针对小组提出的查阅同样资料的请求，美国根据该国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的双边安全情报共享安排，允许一个小组成员(澳大利亚公民)全面查阅这两份“符合请求”的档案。该小组成员检查了向她展示的这两个档案中的资料，经过评估认为，这些资料无助于确定与坠机原因或是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或其随行人员的死亡原因有关的事实。她还认为，档案中没有任何资料涉及侦听到的与袭击 SE-BDY 有关的通讯。

83. 小组除了索取两份“符合请求”的档案中所载资料，还请美国政府在查找资料时包括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总清册(即档案和记录的详细目录)中进行查找。小组还表示，希望现在可以把找到的任何相关保密文件全部或部分解密，提供给它。美国政府在 2015 年 6 月 9 日的一封信中就此告诉小组，经过查找，没有发现任何文件符合对小组索取的材料的描述，而且查找工作也包括了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记录(见附录 6)。

84. 同样是为了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小组还请美国政府提供其可能掌握的资料，显示 Southall 是否曾在美国海军服役，Abram 是否曾在美国空军服役的资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是否于所涉时间分别在塞浦路斯和希腊的监听站服役，以他们自己所述身份为国家安全局工作。美国政府在 2015 年 6 月 9 日给小组的答复中根据国务院掌握的资料确认，Southall 当时是美国海军现役军人，但没有提供任何更多的资料来说明他当时是否在塞浦路斯服役，也没有说明他在海军服役的身份。在编写本报告时，国防部按照小组关于 Southall 和 Abram 的问题查找资料的工作尚无结果。

85. Abram 应小组的请求，向后者提供了他的退役记录的副本，其中说明，他于所涉时间在美国空军服役，职务是“通话监听专家”和“口译员”。小组根据该文件得出的评估意见是，Abram 关于自己于 SE-BDY 坠毁时受雇于美国空军，履行他所称特殊职责的话看来是真实的。然而，虽然 Abram 提供了题为“学历记录”的第二份文件的副本，其中说明，他上的最后一所平民学校是“希腊伊拉克利翁”，但没有注明“就读日期”。小组因此无法确认，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的事件发生时，Abram 是否被派驻在伊拉克利翁。

资料类型

86. 在 Southall 和 Abram 所提供资料的类型方面，这两个人都说，他们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听到(Southall 则有可能是看到)那段无线电通话时，旁边还有其他人。Southall 曾在 1990 年代几次试图让一个据称当时也在监听站的同事，Tyler Wat，讲述自己所闻所见。根据 1993 年 7 月 28 日 Southall 与当时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担任外交官的 Wat 之间的通信，后者告诉美国记者 Staffan Torsell，他对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的“没有任何特别的记忆”。Southall 曾试

图与其他当时在场的同事进行接触，或证实这些同事当中是否有任何人对当晚发生的事有着与他相似的记忆，但看来这些努力也没有成功。小组获悉，Wat 已经不幸去世。由于没有更多的资料来佐证 Southall 关于听到一段无线电监听录音或看到录音抄录的宣称，他提供的新资料是孤证。同样，由于没有伊拉克利翁监听站的同事们或其他某种来源提供的独立证明资料，Abram 的陈述也是孤证。

资料的可信度

87. 小组在评估上述资料的可信度时注意到，Southall 表示，他的通讯侦听官于 9 月 17 日夜当地时 1900-2100 时(协调世界时 1700-1900 时)把电话打到他的住所，敦促他在“大约午夜前后”回到通讯设施，目睹“有意思的事情”。根据索尔兹伯里飞行信息中心的录音抄录，SE-BDY 在协调世界时 2002 时(塞浦路斯和恩多拉当地时间 2202 时)首次打破无线电静默，机组用高频率无线电与该中心联系，包括报道其当时位置和抵达恩多拉的估计时间。小组无法从手头材料中找到迹象显示，SE-BDY 的机组或乘客在此之前把抵达恩多拉的估计时间告诉任何人。与此相反，机组寻求掩盖其飞行路线和估计抵达时间，提交了一份把卢卢阿布尔(恩多拉西北 1 200 公里)，而不是恩多拉列为目的地的飞行计划，并走了一条迂回路线，据称，机组人员对这条路线的细节严加保密。此外，利奥波德维尔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没有报告其工作站与 SE-BDY 之间或任何工作站与该飞机之间在后者飞往恩多拉时进行了任何通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哈马舍尔德在飞行期间通过飞机上的密码机发出或收到任何通讯。小组因此认为，无法解释该通讯侦听官如何在当晚获悉 SE-BDY 抵达恩多拉的估计时间。

88. 关于 Abram，他向小组提供的事件回忆与他以前提供给其他方面，即媒体和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在后者结束工作之后)的情况相一致。此外，他关于其职责的陈述包括轮班，这可以支持他的这一宣称：在出事夜间，他很晚还在监听站。

专家技术评估

89.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联系了曾担任过战斗机飞行员的飞机事故调查员 Sven Hammarberg，请他帮助检查 Southall 的陈述内容等资料的技术可能性。

90. Hammarberg 考虑了 Southall 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所作陈述中的这句话：“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你能听到机关炮在开火。” Hammarberg 指出，Fouga Magister 型飞机上的无线电发射按钮和飞机武器系统扳机都在飞行控制杆上，因此他质疑飞行员怎能一边进行无线电对讲，一边开火。不过他又指出，飞行员以外的另一名机上人员使用操纵杆上的按钮进行无线电通话也是有可能的，尽管这种做法不正规。可是，在 Southall 的回忆中，无线电通话中的人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这就意味着这个人与使用飞机武器开火的是同一个人。而且，假如 Southall 是根据抄录而非录音音频形成他的看法，那就不可能“听到”开火的声音。

91. Hammarberg 还考虑了在塞浦路斯截听到恩多拉无线电通话内容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加丹加的 Fouga Magister 型飞机上仅配有甚高频无线电设备系统，该频段无线电的传播性质使之仅能传递到可视范围内(地面站与飞行高度 5 000 英尺的飞机之间的通讯能传递到约 140 公里的范围内)。因此，要在塞浦路斯或希腊接收到这种无线电通讯，就需要有中转接收发射站，先接收恩多拉的这类通讯的录音或抄录，再将它传送到远距离的监听站。但如果通讯使用的是高频，则无需中转站即能在塞浦路斯或希腊进行侦听。

92. 小组另请专家作出评估，5 000 公里以外的监听站有无可能侦听到恩多拉的无线电通讯，或位于如此远距离的设施是否至少有可能接收到侦听通讯的录音。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空中导航委员会成员、注册专业工程师 Jeff Bollard 对 Hammarberg 的分析结果表示认同。

93. 关于甚高频通讯可能是以什么方式中转到监听站的问题，小组注意到，皇家罗得西亚空军中队长 John Mussell 曾告诉联合国调查委员会，9 月 17 日晚，“美国的达科他型飞机就停在[恩多拉的]停机坪上，引擎一直在转”，因而有提供转播能力的潜在可能性。不过，美国空军驻比勒陀利亚空中武官 Don Gaylor 中校向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作证说，9 月 17 日夜协调世界时 1200 时(恩多拉当地时间 1400 时)后，直到他第二天参加搜寻，就没再从这些飞机内进行过无线电发射，而且他在 SE-BDY 飞行期间没有与它联系过。尽管如此，联合国委员会还是考虑了是否有下列可能性：停靠在恩多拉地面上的其他飞机或在恩多拉上空周围的飞机扮演了甚高频通讯中转站的角色，提供关于 SE-BDY 位置的情报，或仅仅侦听关于当晚事件的消息。委员会虽然没有发现这类证据，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证明价值

94. 概括地说，虽然某些说法的细节不同，但 Southall 和 Abram 都表示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听到过他们认为是有关开火袭击、导致 SE-BDY 坠毁的事件的无线电通话或看到过通话抄录。他们的说法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包括他们在事件发生当口是否真的分别身处他们所称的地点，他们肩负的责任又能否使他们接触到这类信息。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本小组都未能从当晚身处两个监听站的任何其他人员那里获得旁证信息。另外，美国政府对任何无线电通讯记录或有关文件都没有提供支持性证据。关于 Southall 说法中时间信息的可信度问题，小组也有一些疑问。尽管如此，我们认为，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从塞浦路斯和希腊的监听站直接侦听高频无线电通讯或通过中转站间接侦听甚高频通讯，包括恩多拉的通讯，是有技术可能性的。

95. 总体说来，小组经过评估认为，由 Southall 和 Abram 提供的新资料在帮助确定 SE-BDY 受到过空中或地面袭击方面的证明价值为“中”。

目击证人在坠机现场看到的情况

96. 与 SE-BDY 受到过外部袭击这种可能性有潜在关联的其他新资料中, 包括一些新的目击证人陈述, 这些人报称去过坠机现场, 在 SE-BDY 残骸上看到过弹洞或其他无法解释的孔洞。纽约美联社驻外记者 Errol Friedmann 当年被派往恩多拉报道哈马舍尔德与莫伊斯·冲伯计划中的会谈。他在 2012 年 9 月 5 日给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书面陈述中表示, 他 9 月 19 日早晨前往坠机地点, 看到“很明显, 刚发生了一场灾难性事故, 大块大块的飞机残骸散落在茂密的林间和稀疏的空地上。”此外, 他看到所有尸体都已被从现场运走。他在书面陈述中表示, “媒体代表们注意到, 散落在地上的所有飞机主要部位上都没有任何子弹或炮弹弹孔的痕迹。”

97. 从他的叙述中看不出他最后一句评论是基于他本人的直接观察还是他的媒体同仁的观察。另外, 小组注意到, Friedmann 头一次看到残骸是在坠机地点正式确认之后, 大家都知道, 当时飞机残骸已被烧得很厉害。鉴于 Friedmann 提供的并非即时情况, 而且似乎是从“媒体代表”那里听到的, 不是本人的第一手观察资料, 小组评估认为, 这条资料在协助判定 SE-BDY 残骸上没有弹孔一事上的证明价值为“弱”。

98. 2012 年 1 月 12 日, Bancroft(现在的 Kirilibombwe)某采矿公司的前公关干事 Wren Mast-Ingle 向 Williams 博士提供了一些新情况, 大意是说, 1961 年 9 月 18 日, 他在骑着摩托车, 沿恩多拉-基特韦公路从 Luanshya 向 Bancroft 方向行驶时, 听到 SE-BDY 坠毁的声音。他打算到失事现场去看看怎么回事, 于是在现场遇到了乘坐两辆吉普车而来的 6 到 8 个穿着作战迷彩服的人, 他们命令他离开。据称, 从离飞机残骸大约 20 米远的地方, Mast-Ingle 看到了附着在机翼下的机身上有一排拳头大小的弹孔。他在陈述中这样说道, “飞机上的大豁口, 孔洞像我的拳头那么大。机翼上侧朝着我, 我就站在机翼后面, 离飞机大概 20 米远, 孔洞从机翼下方一路扫到机身, 好像被子弹扫射过, 飞机上整整一排孔洞, 少说有五、六个。”他接着表示, 他当时没有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官员, 因为“最好避免卷进政治漩涡里去。”他还说, 飞机并未燃烧。

99. 关于如何评估 Mast-Ingle 提供的情况, 小组注意到, 他表示他是在黄昏前后到达坠机现场的, 尽管他不太确定他到那里的准确时间, 但他说“肯定与官方的讲法有分歧”, 也就是说, 并不是正式事件记录所认定的 SE-BDY 坠毁时间, 即午夜之后不久。因此, Mast-Ingle 的说法——或至少这一部分——与正式的坠毁时间记录不吻合, 但这未必就排除了他关于去看过失事现场的说法在其他方面也不可信的可能性。

100. 而且, Mast-Ingle 还回忆说, 他到达失事现场时, 飞机残骸没有燃烧痕迹。可是小组要指出, SE-BDY 撞击地面时携带着大量燃油, 坠机过程造成机体和其

他主要部件分崩离析。小组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在坠机过程的某一时刻，燃油会燃起熊熊大火。而且，看到了坠毁过程的目击证人或在正式确认的坠毁地点的时间之前或稍后赶到的人，大部分都以种种说法描述道，看到飞机在空中着火了；坠毁的同时有闪光和爆炸；看到飞机残骸燃烧得很厉害。另一位新的证人是《北极星报》的记者 **Marta Paynter**。她在 9 月 18 日下午当地时间 1510 时之后某个时刻前往过失事地点，她也说看到飞机被烧得很厉害。

101. 在小组看来，**Mast-Ingle** 对坠机现场某些方面的回忆的准确性是个问题，特别是他探访现场的时间和关于飞机是否正在燃烧或被烧过的说法与小组掌握的其他有关当时情景的资料有歧异。小组还注意到，他的回忆不是在事件发生之际、而是事件发生 50 多年后作出的。不过小组承认，有可能当他看到现场时，那排孔洞是在一块尚未燃烧的飞机残骸上。基于这些因素，小组评估认为，**Mast-Ingle** 所提供信息的证明价值——特别是在能于多大程度上帮助确定飞机某些部分已被“子弹扫射过”这个问题上——为“弱”。

102. 在关于飞机残骸状况的其他新信息中，还有 **Richard Martin Ridler** 2013 年 4 月 10 日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作出的陈述。他说他现已过世的叔叔 **James Ian Cunningham Waddicar** 告诉他，当时看到 **SE-BDY** 的残骸上“弹痕累累”。飞机失事的时候，**Waddicar** 正担任皇家空军军官，在恩多拉为英国政府服务，具体任务是为社区提供畜牧技术培训。他既没提到弹孔的大小，也没提到分布情况，不过“表示印象中这些弹孔是机关枪扫射造成的”。

103. 小组注意到，**Ridler** 叔叔所见情况中的信息是事件发生多年后的传闻。另外，信息中也没有准确说明 **Waddicar** 是在坠机现场看到的上述情况，还是可能过后在恩多拉机场飞机库里看到的(飞机残骸后来移至那里以供进一步检查)，而且没有说明时间。尽管要承认 **Waddicar** 在皇家空军服务的经历，但无法肯定他是否有资格对造成飞机残骸上孔洞的原因做出权威判断。小组评估认为，**Ridler** 提供的情况在协助确定飞机残骸上有弹孔一事上的证明价值为“无”。

专家就空袭问题进行的弹道学技术分析

104. 为了判断本节中各种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小组还征求了弹道学专家的评估意见。不过先来看一下，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曾指出，“在残骸及残骸周围未发现坠毁前爆炸的迹象或火箭弹的痕迹”，而且还检查了其他貌似子弹造成的孔洞并令专家满意地被排除了子弹射击的可能性。此外，联合国委员会认为，与飞机的形态和它浅浅削过一片树顶的事实相吻合的解释是，飞机是在控制状态下飞行，小角度下降准备着陆，而不是飞机受到袭击、或因炸弹爆炸或其他形式武器所导致的毁坏而失去控制、或为躲避空中威胁而采取规避动作。

105. 联合国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曾邀请瑞士刑事学家 **Max Frei-Shulzer** 博士检查 **SE-BDY** 的残骸，看有无外来子弹、炸弹、定时炸弹之类东西残存痕迹的证

据。Frei-Shulzer 博士进行了直观检测，并将一些飞机残骸碎片熔化，将机体的铝材料同其他金属分离开。他报告说，熔化后剩下的铝金属总重 3 189 磅(1 446 公斤)(小组无法判定这部分材料占所搜集飞机残骸材料总重的百分比)。他的检验结果没有显示出任何涉及外来子弹、炸弹爆炸或引爆装置的痕迹，因此他认为，可以“排除发生了来自空中或地面的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蓄意破坏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106. 联合国委员会发布报告后不久，瑞典国家法证研究所专家 Nils Landin 发表了另一份专家技术分析，对 Frei-Shulzer 博士所做结论的确定性提出质疑。Landin 在 1962 年 5 月 25 日致瑞典外交部的信中写到，Frei-Shulzer 博士没有(鉴于失事现场飞机残片的体积及分散程度，也没有可能)检查每一块飞机残骸，因此就存在这样一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即在未经检查的残骸部分或在失事现场，有未曾探测到的外来子弹、炸弹爆炸、引爆装置或其他空袭证据的痕迹。

107. 小组在评估 Landin 所提供信息的证明价值时认为，他提出的这一论断是可信的：因为没有检查所有残骸材料，所以不能得出确凿结论，排除空袭(或蓄意破坏，这一点本报告后面还要讨论)的可能性——。为此考虑了小组专家的这一理解：要通过技术分析得出确凿结论，就必须彻底检查过所有掌握的材料才行。小组根据这一理解评估了一些证人声称看到飞机残骸上有弹孔的说法，认为 Landin 提供的信息在协助确定 Frei-Shulzer 博士对飞机残骸的检查不足以像博士本人所认为的那样，能完全排除空袭或地面袭击等敌对行动的可能性方面，证明价值为“中”。

雇佣军飞行员或其他特工介入的可能性

‘Beukels’

108. 瑞典外交官 Bengt Rosio 在其 1993 年 2 月发表的题为“恩多拉灾难”的调查报告中概述了一种说法，即名为“Beukels”的比利时籍雇佣军飞行员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意外将 SE-BDY 击落。Rosio 是 1992 年晚期应瑞士政府要求，对哈马舍尔德之死的环境作进一步调查的，而瑞典政府的要求又是因为联合王国一家报纸《卫报》于 1992 年 9 月 11 日刊登了两名联合国前高级官员 George Ivan Smith 和 Conor Cruise O’ Brien 博士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表示，他们有证据可以证明，是雇佣军飞行员试图让哈马舍尔德的飞机改变航线、从而阻止他会见莫伊斯·冲伯时，意外将飞机击落的。据称，他们手上的证据是“Beukels”把这个故事讲给法国外交官 Claude de Kemoularia 时的谈话录音。这些录音带在 Smith 手中。Rosio 在调查过程中，到巴黎去见过 de Kemoularia，其间 de Kemoularia 说，他是 1967 年在巴黎约谈“Beukels”的。

109. 关于 de Kemoularia 的背景情况，他 1957 年至 1961 年间服务于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哈马舍尔德的个人助理。1984 年至 1987 年，他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在据称与“Beukels”谈话的时间，即 1967 年 2 月 13 日，他是住在巴黎的一名商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 *Une vie à tire-d'aile: Mémoires*(2007)中叙述了他与“Beukels”的会面，内容与 Rosio 报告中的说法基本相同。

110. Smith 的磁带录音和 de Kemoularia 的回忆录都描述了这一经过：“Beukels”驾驶着一架 Fouga Magister 型喷气式飞机从科卢韦齐机场(位于恩多拉西北方约 430 公里处)起飞，伴行的是同型号的另一架飞机(“Beukels”没有说明这第二名飞行员的身份)。据称，他们两人受“X 先生，据信是一个凌驾于军事指挥之上的高级别人士”和 Lamouline 中校(加丹加部队总司令)之命，在恩多拉附近拦截 SE-BDY，使其改道前往卡米纳机场(位于恩多拉西北约 620 公里处)，让哈马舍尔德在那里会晤一名“很有影响力的欧洲公司高管”。他们得到授权，假如 SE-BDY 的飞行员不服从改变航线的指令，则可以开火警示，告诉对方他们是来真格的。

111. 据“Beukels”称，他们准确知道秘书长飞机的位置及其抵达恩多拉的估计时间，有些信息是恩多拉的空中交通调度员提供的，而他的 Fouga 型飞机配有精良的无线电设备和雷达系统，能在夜间进行准确的空对空拦截。“Beukels”称，他的 Fouga 升空了两小时。他说，为了帮着他拦截 SE-BDY，恩多拉的空中交通调度员指挥 SE-BDY“多绕了一圈”，从而增加了 30 公里的飞行路径。当 SE-BDY 似乎没有按照“Beukels”的指令改变航向时，据称他就用飞机的机关枪从 SE-BDY 后部开火，结果意外击中了 DC6 的水平尾翼。“Beukels”说，“飞行员失去了控制，飞机开始摇摇摆摆”，然后就坠毁，燃起了大火。

112. Smith 和 O’ Brien 在《卫报》文章中提到的录音带并非“Beukels”本人叙述故事的录音，而是 1981 年 9 月 17 日 de Kemoularia 与 Smith 会面时，他把他与“Beukels”谈话时的笔记由法语翻译成英语的录音。尽管 Rosio 向 de Kemoularia 提出了要求，但 de Kemoularia 没有向他提供法文笔记副本、录音带或录音的抄录。Rosio 在完成调查任务后，收到了一个可能是由 Smith 编写的事情经过。小组在博德利图书馆的 Roy Welensky 文档中也发现了由 Smith 编写的一个较早版本的事情经过。Smith 在 1981 年 12 月 8 日致 de Kemoularia 的信中，说明了他如何根据之前与 de Kemoularia 的谈话编些了这个经过。Smith 在信中还指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并建议了下面可以采取的步骤。看来，他们有意将事情经过最后定稿，在 SE-BDY 失事二十周年之际发表。

真实性评估

113. 为了做出证明价值评估，小组在 2015 年 4 月 23 日向法国政府提出协助请求，请法国有关当局寻找并提供它们可能掌握的任何同 de Kemoularia 与“Beukels”之间交往有关的材料，以及任何其他提到了一位被称为“Beukels”的比利时飞行员的材料(见附录 3)。小组表示，鉴于时过境迁，希望在必要情况下将有关文

件全部或部分解密，提供给小组。同样，小组也请比利时政府有关当局寻找并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任何有关一位据称是比利时国民、名为“Beukels”、1961年可能在刚果或周围担任飞行员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加丹加部队的人员的材料(见附录 2)。

114. 法国政府在 2015 年 6 月 2 日的答复中表示，经搜寻外交与国际发展部档案，未发现“de Kemoularia 与一位名为‘Beukels’的比利时飞行员就达格·哈马舍尔德之死进行的谈话”。答复中还说，“这些档案是公开的，不是保密档案。”法国政府还表示，曾询问 de Kemoularia 可否参加质询活动，但 de Kemoularia 表示，因“年龄和目前的健康状况”，无法应约。比利时政府提供的材料答复了小组资料请求中的其他几方面问题，但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日，它尚未提供信息，说明其档案和记录材料中有没有关于一个可能存在的名为“Beukels”的飞行员的资料(见附录 2)。

证明价值

115. 小组无法确认 Smith 手中的 de Kemoularia 与“Beukels”谈话的口述录音带是否还在。同样，小组也没能找到 de Kemoularia 与“Beukels”谈话的原始记录。鉴于 de Kemoularia 对哈马舍尔德之死的环境明显抱有浓厚的兴趣，小组感到不解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在获得上述资料之时就把它拿出来。要注意的是，Rosio 在其 1993 年报告的尾注中说，de Kemoularia 1968 年曾把上面的故事告诉过联合国高级官员 Brian Urquhart。当时 Urquhart 建议他通知警察。显然，他没有这么做。

116. 鉴于上述情况，小组评估认为，de Kemoularia、Smith 和 O’ Brien 提供的关于一名叫“Beukels”的比利时籍雇佣军飞行员参与击落 SE-BDY 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Van Risseghem

117. 2014 年 2 月，美国政府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提供了一份已解密的 1961 年 9 月 18 日由利奥波德维尔发往华盛顿的电报。驻利奥波德维尔的美国大使在电报中提请注意一名据他说可能击落了 SE-BDY 的比利时飞行员。格利恩大使在电报中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的飞机]有可能是被一名飞行员击落的，这名飞行员骚扰过联合国的行动，据一名通常很可靠的消息来源指认，这个飞行员名叫 Vam (rpt VAK) Riesegehel，比利时人，是在所谓的加丹加空军接受的飞行训练。以前他被当成了身份不明的罗得西亚人。只要他仍在活动，就有可能破坏空中救援行动。”

118. 随后,小组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和 23 日分别请比利时政府和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查找并提供它们可能掌握的任何有关 Van Risseghem 的活动的资料(分别见附录 2 和附录 6)。

119. 比利时政府提供的资料大意是,哈马舍尔德 9 月 16 日曾向比利时外交部长 Henri Spaak 发去一份电报,请比利时政府合作,制止 Van Risseghem 侵犯联合国及其房地产的罪行以及对平民的袭击。于是,比利时政府(包括比利时特工机关)进行了调查,发现 Van Risseghem 已于 9 月 8 日由 Zaventhen 入境,从卡米纳返回比利时,移民局登记有他在国家机场的入境记录。接着,他又于 9 月 16 日离开比利时 Lindt,表示他要返回加丹加,继续在其空军服役。于是他乘飞机离开比利时赴巴黎,再从巴黎前往加丹加。调查结论是, Van Risseghem 于 1961 年 9 月 8 日至 16 日期间在比利时境内,因而来不及从比利时返回刚果,于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驾驶 Fouga 型飞机或任何其他飞机飞越恩多拉或周围地带上空。

120. 另外,美国政府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于 1961 年 9 月 22 日发往华盛顿的电报。电报中写道,据比利时安全和情报官员称, Van Risseghem “应当是于 9 月 17 日在驻布鲁塞尔的加丹加‘使团’发给他的退役酬金收据上签了字。”不过,比利时政府却指出,他签字的文件是让别人代他从“萨比那共济基金”领钱的委托书,当时他可能仍在布鲁塞尔,也可能已经到了巴黎。

121. 不管怎样,比利时政府能够确认 Van Risseghem 最早不会早于 1961 年 9 月 16 日之前离开布鲁塞尔,因此能证明他不可能及时赶到加丹加去对 SE-BDY 进行空袭。基于这个理由,小组评估认为,美国政府提供的 1961 年 9 月 18 日电报中关于一个名为 Van Risseghem 的比利时雇佣军飞行员参与了对 SE-BDY 空袭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据称的中情局合同人员

122. 研究者兼记者 Lisa Pease 在 2012 年 9 月提交哈马舍尔德委员会一份书面材料,提出一个据称的中情局特工人员 Roland ‘Bud’ Culligan 应对击落 SE-BDY 负责。Pease 还附上了种种文件,其中特别包括:她在 Probe 杂志 1999 年 3-4 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Midnight in the Congo; Christopher Farrell 的信件,这个人似乎在 1976 年和以后帮助过 Culligan 争取从美国监狱中获释; Kenn Thomas 1994 年在 Steamshovel Press 上发表的文章; Culligan 发给其他人、包括中情局总顾问和中情局局长的信;还有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若干“记录查询表”,显示中情局尚未公布有关 Culligan 的记录。

123. 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 Culligan 声称自己是“职业杀手”,为中情局至少服务了 25 年,这中间包括 SE-BDY 坠毁的时候。他在手写的信中叙述了自己怎样驾驶 P38“闪电”飞机,从黎波里出发,经阿比让和布拉柴维尔到达恩多拉,拦截并击落了 SE-BDY。文件显示,关于 Culligan 的资料是 Christopher Farrell 律

师提供给佛罗里达州检察长 Robert Shevin 的,后者又将这些资料转给美国参议院研究政府针对情报活动所开展行动特别委员会(丘奇委员会)。Culligan 声称有当时的日记记录了他自己的活动,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小组也没有收到这样的日记。Pease 表示,她认为 Culligan 已于 2010 年去世。

真实性评估

124. 小组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请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查找并提供它们可能掌握的任何有关 Culligan 的上述说法的资料,以助评估工作。此外,小组还请求提供资料,说明在事件发生那段时间, Culligan 是否被中情局或美国政府其他部门招募过或与之签订过合同,他是否开展了与中情局或美国政府其他机构的工作有关的活动。此外,小组还请求美国政府提供它可能掌握的、关于 Culligan 是否有必要知识和技能来驾驶飞机、从事他所声称的那种性质的任务的资料。

125. 美国政府在 6 月 9 日的信中说,“经查阅中情局在上述事件之时的记录,未发现提到过 Culligan 先生。”小组未能找到资料,说明丘奇委员会是否处理过有关 Culligan 的问题;若然,又是如何处理的。

可信度评估

126. 小组注意到, Culligan 的说法中没有关于如何击落 SE-BDY 的详情,包括他通过什么手段获得了所驾驶的飞机,又是使用了什么方法得以在恩多拉上空拦截 SE-BDY。另外, Culligan 似乎到了 1976 年才第一次泄露上述说法,当时他正想法从监狱获释。Culligan 在 1978 年 10 月 30 日给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海军上将 Stanfield Turner 的信中说,已向 Turner 上将提供了他的日记,但又威胁说要公开他手中的材料,包括日记副本,除非他所称的当局对他不公正起诉的问题得到解决。不过随后, Farrell 在 1978 年 12 月 6 日给“美国特工局特工 Albergine”的信中又说,他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就算没有日记副本,也能让任何人都信服这些年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1977 年 3 月,在 Culligan 就要从监狱释放之前,中情局顾问 Anthony Lapham 也收到过类似的威胁。小组不清楚,上述资料到底有没有像他们所打算的那样悉数公开,另外这些资料里到底有没有 Culligan 所提到的日记。

127. 在缺乏其他资料确认 Culligan 的资历和对事件的说法、包括他声称日记中记录了详细经过一事的情况下,小组评估认为, Pease 提供的资料在协助确定据称的中情局特工 Roland ‘Bud’ Culligan 参与对 SE-BDY 的空袭一事的证明价值为“弱”。

上加丹加联合矿业雇员

128. 当时担任联刚行动代理主管的 Robert Gardiner 在 1963 年 1 月 16 日发给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的电报中报告说,一些刚果证人以

及匿名致信瑞典驻利奥波德维尔领馆的人都称，供职于上加丹加联合矿业的比利时籍雇员 Andre Gilson 受命空袭 SE-BDY 并将其击落。据说，Gilson 是在卢本巴希的联合矿业餐厅里跟这些证人谈到他参与袭击事件的。1963 年 8 月 28 日，联刚行动人员在伊丽莎白维尔审问了 Gilson。Gilson 在审讯中称，他自 1961 年 7 月 10 日起受雇于设在伊丽莎白维尔的联合矿业，担任会计；1961 年 9 月 13 日至 27 日之间，附属于该公司商品与供应民事办公室。他说他不是飞行员，没有在加丹加空军中担任任何职务。联合国调查活动的结论是，Gilson 的证词是合乎事实、有据可查的，因此前述指控不能成立。而且，在调查中还发现，Gilson 在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的行踪是可以说清楚的，他缺乏实施有关袭击所必需的训练和信息。

129. 既然参加联合国审讯工作的人能够独立核证 Gilson 在那关键一夜的行踪，则小组评估认为，新资料在协助确定 Gilson 参与对 SE-BDY 的空袭一事上的证明价值为“无”。

其他雇佣兵或特工

130. 前美联社记者 Errol Friedmann 在 2012 年 9 月 5 日提供给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一些新情况中谈到，飞机坠毁后那些天，他住在恩多拉的爱丁堡饭店，在那儿遇到两名比利时飞行员。他们告诉他，他们“骗过了[罗得西亚]委员会”。据说，他们接着声称，在哈马舍尔德乘坐的那架“漆成白色的 DC6”靠近恩多拉的时候，他们与那架飞机有联系并曾“掠过”那架飞机，逼得 SE-BDY 的飞行员采取规避动作。他们说，第二次“掠过”DC6 的时候，飞到了那架飞机的上方，与机身贴得很近，逼得 DC6 向地面下降。Friedmann 提到，那两个飞行员当时已喝了不少啤酒，情绪狂放。

131. 第二天，在罗得西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Friedmann 坚称，关于他与两名比利时飞行员的邂逅，他已经留了一封短信给他的同事 Adrien Porter。他当天晚些时候要离开恩多拉，Porter 将接替他驻在恩多拉。Friedmann 留在 Porter 椅子上的短信后来到了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顾问 Cecil Margo 手中。Margo 告诉 Friedmann，如果他不主动交代证据，则“Margo 将用法律手段迫使我交代。”Friedmann 与纽约的新闻编辑商量了一下，新闻编辑指示他不要拖延，立即离开恩多拉前往南非。在恩多拉机场，当地广播电台广播，请他与最近的警察局联系或拨打某个电话号码。Friedmann 没有遵从广播中的指示，第二天离开恩多拉赴约翰内斯堡。

132. 关于 Friedmann 与比利时飞行员的邂逅，Cecil Margo 在他的著作 *Final Postponement: reminiscences of a crowded life*(1998)中给出了一个不甚相同的版本。他说，Friedmann 找到他，说自己住在 Savoy 饭店时，那里的一个飞行员说了上面那些话。

133. Joseph Delin 少校是加丹加空军的一名飞行员，曾向罗得西亚委员会作证。1962 年 1 月 16 日，他们把他召回，询问他是否向 Friedmann 说过那个特别的短语或类似的话。Major Delin 答复说，他一辈子都没用过这种说法。他只记得跟某人闲聊了几分钟，据他说，聊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他又再次强调，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无论是他还是别人都没有驾驶加丹加空军唯一的一架、停靠在科卢韦齐机场的 Fouga Magister 型飞机飞行过。他说，他知道哈马舍尔德要前往恩多拉，但对他如何去和到达的确切时间并不知情。

证明价值

134. 小组考虑到下列因素，经过评估认为，Friedmann 所提供的情况在协助确定所说的两名比利时飞行员(其中一名看来是 Delin 少校)参与对 SE-BDY 的空袭一事上的证明价值为“无”：上述这一切，特别是指控的严肃性；Friedmann 在完全清楚罗得西亚委员会要求他作证的情况下，不愿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以使他的说法得到充分检验；Delin 少校在罗得西亚委员会面前矢口否认说过 Friedmann 所称的那些话。

两个身份不明的比利时飞行员

135. Martin Hillebard 也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提交了类似的书面材料，介绍了他的伙伴 Eva Aminoff 对有关“两个身份不明的‘比利时空军飞行员’受命击落 SE-BDY”这种说法的调查情况。Aminoff 当时是一名作家和记者，据她说，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晚间她就在恩多拉，与其他媒体人员在一起。据说，她若干年后告诉 Hillebard，她对事件开展了自己的调查，其间曾与两名飞行员谈过话，他们告诉她，他们受命“击落 DC6”，于是他们通过“简单的抓阄[来决定]由谁来干这件脏活儿”。

136. 小组要指出，虽然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数个国家的国民当时加入雇佣军，支持加丹加省政府，有些人担任了飞行员，但在缺乏进一步细节，包括姓名及其他个人识别特征的情况下，很难检验这类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此外，小组还要指出，Hillebard 的陈述是传闻，不是当时所见所闻，缺乏可以与其他证据互相对证的信息。小组评估认为，Hillebard 提供的新资料在协助确定两个身份不明的“比利时空军飞行员”击落 SE-BDY 一事上的证明价值为“无”。

对可能的飞机类型和起降机场的专家技术评估

Fouga Magister 型飞机

137. 联合国委员会在 1961-62 年的调查中，检查了“对 SE-BDY 进行所称空袭或空中威胁可能使用的是哪种类型飞机”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基本集中在 Fouga Magister 这种飞机上。这是法国制造的一种小型两座喷气机，主要用于飞行训练和骚扰任务。联合国委员会确证，事件发生之时，加丹加空军有一架 Fouga 正在

飞行；委员会并且指出，在坠机事件发生前，这架飞机一直在骚扰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不过骚扰行动几乎完全集中于地面目标。这架 Fouga 一般停靠在科卢韦齐空军基地(位于恩多拉西北大约 430 公里)，联合国委员会认为这个距离过于遥远，Fouga 不足以完成一个往返。然而，联合国委员会同时指出，飞机机长 Delin 少校在向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曾表示，“这架‘Fouga’至少有一次是从沙石跑道上起飞的。”因此，联合国委员会认为，“看来没有什么能排除[这架 Fouga]使用一条在恩多拉往返航程内的飞机跑道的可能性。”Delin 还向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作证说，“在卡米纳附近，他曾向一架升空的 DC3 飞机发射了一梭子[子弹]。”

138. 关于 Fouga Magister 飞机是否有能力对 SE-BDY 进行袭击或以其他方式相威胁的问题，曾任战斗机飞行员的飞机事故调查员 Hammarberg 提供了新的资料。因这种喷气式飞机的最大作战航程限制(按飞行高度 5 000 英尺计算，作战距离约 419 公里)，Hammarberg 对这架飞机能否一次性升空、从科卢韦齐至恩多拉往返表示严重怀疑。他指出，在这两个地点之间往返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其间只够留出大约 5 分钟在恩多拉进行战斗操作的时间。为此，飞行员就必须非常精确地了解 SE-BDY 的飞行路线和抵达时间，依此安排他/她抵达拦截的时间。

139. 小组注意到，索尔兹伯里航班信息中心的记录表明，在协调世界时 2002 时，SE-BDY 估计它抵达恩多拉的时间是协调世界时 2235 时。当 SE-BDY 于协调世界时 2135 时第一次与恩多拉塔台联系时，估计抵达恩多拉的时间为协调世界时 2220 时。根据 SE-BDY 在甚高频 119.1 兆赫上向恩多拉塔台发出的、由恩多拉塔台调度员 Martin 在飞机进程单上记下的报告，SE-BDY 实际抵达恩多拉机场上空的时间是协调世界时 2210 时。一些向正式调查活动作证的证人的证词与上面所报告的抵达时间相吻合。基于估计抵达时间与实际抵达时间相差 25 分钟之多，小组认为，如果没有周密的支援性安排、包括依靠雷达提供更准确的情报，很难相信一架 Fouga 能准确把握从科卢韦齐飞抵恩多拉的时间，一次性升空、在拦截 SE-BDY 之后仍留有足够的燃料返回科卢韦齐。不过，同联合国委员会一样，Hammarberg 也不完全排除 Fouga 利用别的、离恩多拉较近的机场的可能性，或者暂时从那里起降，或是仅仅加油。

140. Rosio 在考虑可供一架 Fouga 使用的其他机场时指出，飞机在加满油的情况下需要约 1 500 米的起飞跑道。一位当时在泛航公司供职、有大量非洲飞行经验的飞行员 von Rosen 机长告诉 Rosio，“除科卢韦齐和基普希[位于恩多拉西北 200 公里处]外，Fouga 还可以从另外 4 个机场起飞”到达恩多拉。另外，Hammarberg 提到瑞典空军 1961 年 12 月编制的一份报告，其中说道，“加丹加境内伊丽莎白维尔以南地区不太可能找到合适的地点”供喷气式飞机起降，不过“并不排除喷气式飞机可以利用简易机场”的可能性。

141. Neil Ritchie 是军情六处官员，也是英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公署一等秘书。在一份未标注日期的通信“秘密：Neil Ritchie 的报告”中，他提到 1961 年

9月17日曾前往基普希。他当时检查了机场跑道，认为大约有800码长(约730米)。他说跑道表面非常粗糙，上面野草丛生，一端还有蚁丘。他让(比利时采矿公司)联合矿业的人员把压路机开来，着手推平那些蚁丘。9月19日，他又到基普希去，看着联合矿业的工人推平蚁丘。如果Ritchie的观察是准确的，那么跑道的有限长度和表面条件之恶劣也许就能排除一架Fouga从那里起飞的可能性，而Rosio当时是把基普希当作了Fouga可能使用的简易机场。

142. 航空专家Hammarberg利用自己担任战斗机飞行员的经验，分析了Fouga飞机在夜间执行空袭的能力问题。关于Fouga飞机的装备及其他方面限制，Hammarberg分析时依据的是Fouga手册中的一般性资料。Hammarberg指出，他对事件发生之际加丹加空军所使用的Fouga的特殊装备和支援性安排并无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出结论认为，在1961年9月17至18日的那种环境状况中，使用Fouga进行夜间空袭的假设缺乏可信度。

143. 小组注意到，因Fouga Magister的上述操作性局限，利用一架这样的飞机在夜间实施空袭会是极端困难的，然而Hammarberg和Rosio提供的新资料却支持这么一种可能性，即Fouga Magister有能力实施这类空中袭击或威胁，而且它可以使用科卢韦齐以外的其他简易机场，包括恩多拉周围航程距离内的沙石简易机场。这并不是说，他们提供的情况能支持“实际袭击SE-BDY的就是一架Fouga”这样一种假设。

144. 小组评估认为，在协助确定“可能使用了一架Fouga Magister，夜间在恩多拉机场上空实施空袭，将SE-BDY击落”的说法方面，Hammarberg和Rosio提供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De Havilland Dove

145. 在1962年1月23日的一份报告中，泛航官员Bo Virving概述了他宣称的事情经过。他说，当DC6准备降落在恩多拉机场时，一架De Havilland Dove飞机发动空袭，向SE-BDY或其周围发射火箭弹，造成SE-BDY坠毁。他的说法几乎完全依靠他对事件当晚目击者的见证所作的诠释，特别是有目击者谈到空中出现了第二架飞机，一架飞机向另一架飞机“开火”。鉴于Virving信件日期早于联合国委员会做出结论的时间，而该委员会也在调查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咨询过他，包括就他关于可能使用的是Dove飞机的说法征求咨询，小组认为，这条资料不属于我们眼下所说的新资料。联合国委员会没有具体提到使用De Havilland Dove的说法，不过却指出，Virving向委员会提出一种理论，说SE-BDY可能是被一架配有火箭弹的飞机袭击并击落的，但委员会认为“他没有提交支持其理论的实质性证据，因此委员会认为，Virving提到的大多数现象都可以有另外的、更合乎逻辑的解释。”

146. 尽管如此,关于 Dove 飞机是否可能有能力对 SE-BDY 实施空袭,小组却找到了新的资料。*Mercenary Commander*(1986)是前雇佣军飞行员 Jerry Puren 口述、由 Brian Pottinger 记录下来的一本回忆录。Puren 在书中说到,早在 1961 年,加丹加空军就使用了 De Havilland Dove 飞机,这种飞机能空袭地面目标。Puren 接着简述了这种做法的技术细节。他说,加丹加空军对 Dove 飞机进行了改造,能从飞机地板处将弹架上的炸弹扔下去。他还叙述了他自称曾参加过的一些轰炸飞行,不过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 1961 年 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从事的任何飞行。

147. Hammarberg 分析了 De Havilland Dove 是否有能力对 SE-BDY 进行空袭的问题。他承认,加丹加空军当时在使用 Dove 飞机,不过他说不准从事正常飞行的有多少架。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判定,9 月 17 至 18 日夜间,在伊丽莎白维尔有两架被联合国扣押的 Dove 飞机,另有 3 架在南非做保养。别有信息来源称,Dove 飞机的基地在科卢韦齐或基普希。此外,Hammarberg 评估认为,由于“实体和技能局限”,说 Dove 飞机能发射火箭弹或炸弹、执行空对空爆炸袭击“没有操作上的可能性”。他谈到了夜间针对空中移动目标进行人工爆破操作(不管是要袭击飞机,还是要让炸弹在飞机近旁爆炸)的困难之处。

148. 小组还注意到,Dove 飞机的最大巡航速度约为 180 至 200 节(333 至 370 公里/小时),而 DC6B 的正常巡航速度约为 270 节(500 公里/小时),因此 Dove 飞机如果要拦截属于 DC6B 型飞机的 SE-BDY,则只有在后者处于远低于正常巡航速度的飞行状态下的时候才有可能。在 SE-BDY 准备进场降落在恩多拉的时候,这是有可能的。请注意,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判定,SE-BDY 在冲击地面的时刻处于着陆形态。由此判断,它的速度应在 130 至 160 节(240 至 296 公里/小时)之间。

149. 虽然 Puren 的回忆录中没有谈到 Dove 飞机实施的任何空对空袭击,Hammarberg 也对这类袭击能否成功实施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但这并不能排除 Dove 有能力实施这种袭击、或可用以对 SE-BDY 进行空中威胁,例如试图让 SE-BDY 改变航向,飞往别处。不过,在缺乏支持性证据的情况下,上述说法无法支持“实际上是用 Dove 对 SE-BDY 进行袭击的”这种假说。小组评估认为,在协助确定“De Havilland Dove 飞机由于其空中攻击能力,可能实施了对 SE-BDY 的空袭或以其它方式对其进行威胁”的说法方面,Puren 提供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Dornier DO-27 和 DO-28

150. 关于可被用来对 SE-BDY 实施空袭或以其他方式加以威胁的飞机类型,还有另外一些新的资料。德国研究人员 Torben Gulstorff 博士给小组提供了一些资料,认为加丹加部队 1961 年 9 月进行袭击时可能使用的是 Dornier DO-27(一种 4 至 6 座单引擎轻型通用飞机)或 DO-28(一种双引擎通用飞机)型飞机。

151. 联合国官员 Knappstein 在发自纽约的信函中简述了 1961 年 7 月与联合国高级官员 Alexander Macfarquah 的会面。会面期间，Macfarquah 谈到，联合国在刚果的情报来源提供的信息称，“刚果共和国(利奥波德维尔)加丹加省政府已安排购买配有军事装备，包括炮架、炸弹架、火箭筒等装备的德国 Dornier 飞机。”信中接着说道，“当时的打算是，这些飞机买来后，将由加丹加的军事人员操作。”消息称，第一架飞机预定于 7 月份的某个时候交付。作者质疑该消息的可靠性，对德国政府会支持加丹加部队持怀疑态度。接着又有其他通信。德国政府在信中询问上述消息的真实性，包括与飞机制造商讨论，并寻求确认 DO-27 飞机有发射火箭的能力，如葡萄牙在安哥拉开展军事行动时所显示的那样。

152. Dornier 公司驻波恩代表、退役上校 Wien 在 1961 年 10 月 5 日告诉西德经济部，1961 年夏季，驻伊丽莎白维尔的一家比利时进口商购买了 6 架 Dornier DO-28 飞机，其中一架飞机于 1961 年 8 月 21 日交付到伊丽莎白维尔，另外 5 架飞机尚未运送。Wien 上校还说，DO-28 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要安装机关枪，但他不排除临时安装机关枪的可能性。

153. 《每日电讯报》1961 年 11 月 6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广播中“紧急呼吁各国停止向冲伯控制下的加丹加运送武器”。文章接着引述在联合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部队服役的印度士兵的话，称加丹加空军过去几天中接收了 5 架新的 Dornier DO-28 飞机，这些飞机停在科卢韦齐机场。他们还提到，从慕尼黑运来的货物中包括一些特别装备，能让 DO-28 携带“炸弹或空对地火箭”。

154. 小组没有理由怀疑 Gulstorff 博士提供的文件的真实性，因为这些文件来源于各种德国档案馆。这些文件在情报信息的基础上提示，1961 年 9 月 17 日的时候，加丹加空军至少拥有一架 Dornier 飞机，而这架飞机也许经过改装，能实施空中袭击和轰炸。Rosio 在 1993 年的报告中指出，Dornier 飞机不配备枪炮或其他武器，但经过改装后可以装备枪炮等武器；另外，虽然据称 Fougas 飞机没有执行过夜间任务，但 Dornier 飞机确实执行过夜间任务，向联合国部队投掷过炸弹。

155. 在性能方面，DO-27 和 DO-28 两种型号均有短距离起降能力，所以可以使用其他类型飞机无法使用的小型短跑道简易机场。不过，DO-27 和 DO-28 的最大巡航速度分别为 130 节(240 公里/小时)和 145 节(270 公里/小时)，而 DC6 准备接近跑道降落的速度一般是 130-160 节之间，所以 DO-27 根本不可能、DO-28 也很难对 DC6 进行有效拦截并操作实施空袭或空中威胁。

156. 小组一方面承认，从飞机性能角度来说，由于 Dornier 飞机较为缓慢的飞行速度，DO-28 要对 SE-BDY 实施空袭是极为困难的，DO-27 就更不用说了，但同时，Gulstorff 所提供的新资料支持“DO-27 或 DO-28 有能力实施这种袭击或威胁”的可能性。这些资料还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9 月 17 至 18 日事件前，有一

架或多架 Dornier 飞机已运至加丹加”的说法。不过，在缺乏支持性证据的情况下，上述资料难以支持“实际上是使用 DO-27 或 DO-28 飞机对 SE-BDY 进行空袭的”这种假说。小组评估认为，称“可能使用的是 Dornier DO-27 或 DO-28 来对 SE-BDY 进行空袭或以其他方式加以威胁的”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五. 关于人为破坏假说的新资料

157. 关于飞机失事的种种可能原因中，联合国委员会调查了 SE-BDY 因受到人为破坏而失事的可能性。委员会的结论是，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但“没有证据表明飞机上有炸弹爆炸；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在飞机飞行期间发生了任何爆炸。”自那时起，关于 SE-BDY 可能因遭受破坏而坠机的问题，小组又掌握了一些新的资料。

南非海洋研究所

158.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于 1998 年 7 月收到(南非)国家情报局提供的一份关于南非共产党领导人 Chris Hani 1993 年遇刺的档案。其中有 8 份文件，据说是南非海洋研究所的内部通信，而据称南非海洋研究所这个组织 1960 年代初期曾在刚果一带及其他地方从事雇佣军地下活动。尽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其任务期限结束前未能查清这些文件和说法的真实性，但为了履行其透明性承诺，委员会除了将这些文件交予前司法部长 Dullah Omar 外，还于 1998 年 8 月将其内容公之于众。

159. 这些文件提到一个代号为“天蓝色行动”的行动，据称其目的是“除掉”哈马舍尔德。命令要求，除掉哈马舍尔德“要采用比除掉帕特里斯更简洁省力的手法”。这个“帕特里斯”应当指的是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前总理，也是第一位民选总理，1961 年 1 月 17 日，加丹加宪兵在其他人的同谋下将其杀害。据同一份文件称，“[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表示同意，并保证他的人会充分合作”，而且“[杜勒斯]告诉美国，达格于 1961 年 12 月 9 日前后会在利奥波德维尔”。文件中还提到，“他乘坐的飞机是一架有‘TRANSAIR[泛航]’标记的 DC6”，并督促说，“利奥[波德维尔]机场和伊丽莎白维尔由你们的人负责。”

160. 上述档案中的另一份文件没有日期，但看来是在第一次发出“除掉”哈马舍尔德的命令之后发的，其中报称，“[比利时采矿公司]联合矿业已提出给予后勤或其他支持”，并接着说道，“我们已告诉他们，在所有可能的位置上都放上 6 磅 TNT 炸药连同引爆器、电触头、连线、电池等”，还称“使用电触头、不用气压装置，你这个决定真高明。”

161. 还有一份手书指令，写在和其他文件一样抬头的公文纸上，日期 1961 年 9 月 14 日。其中，“舰长”向“舰队司令”报告称：

“带‘Transair’徽记的 DC6 飞机正停在利奥[波德维尔]，等待运送目标人。我们的技术员已接到命令，将 6 磅 TNT 炸药及接触引爆器安装在轮舱里，起飞收轮时即可引爆。我们正等候了解目标人起飞时间，然后行动。”

162. 另外一份文件，日期难以辨认，似乎是一个“刚果红”代号向“舰队司令”和“舰长”报告事件的情况：

1. 起飞时装置失灵。
2. 派出鹰[辨认不清]到[辨认不清]。
3. [辨认不清]降落之前[辨认不清]引爆了。
4. O’ Brien 和 McKeown 听从建议，没上飞机。
5. 任务完成：满意。

真实性评估

163. 小组为了作出证明价值评估，需要对这些文件的作者和真实性进行分析，即这些文件是否由所称的作者——南非海洋研究所、海洋所官员或特工——书写，而且是否真是所称的文件。为此，小组首先努力确认文件的真实性。其次，小组注意到，其中一份文件中，该研究所的缩略名称写成了 SAIMAR，而不是通常的 SAIMR。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 Williams 博士都曾努力获取这些文件的原本或请专家通过技术分析确认他们手中的版本的真实性，然而不果。小组则向南非共和国政府发出请求，请它寻找并提供有关这些文件的任何记录或其他材料；任何提到南非海洋研究所在事件发生之际的存在的参考资料；或南非政府可能掌握的任何能否认或旁证上述据称的计划的资料(见附录 5)。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时，尚未收到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答复。

164. 另外，小组还联系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前首席调查员，询问他是否能回忆起任何有助于评估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的事情。本报告撰写之时，小组尚未收到任何回音。因此，由于小组手中只有这些文件的粗劣复印件，所以无法判定这些文件的权威性或真实性。

165. 与真实性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南非海洋研究所 1961 年时是否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哈马舍尔德委员会调查发现，“关于南非海洋研究所，几乎没有什么确凿情况”，“委员会找不到这个研究所发表的任何科研成果。”

166. 以下所有因素进一步加深了小组对这些文件真实性的极大怀疑：没有文件原本；无法确证南非海洋研究所在 1961 年的存在；找不到这些文件或部分文件的作者、或任何亲身了解或熟悉这些文件内容的人；在据说的文件形成年代 1961 年与后来交给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 1998 年 7 月及最终的公诸于众之间，这

些文件身处何地、陆续经过谁手，都说不清楚；复印件的真实性难以确定，其中的文字存在歧异，包括其中一份文件中连 SAIMR 这个名称都搞错。

167. 为了进一步评估证明价值，小组还检查了文件的内容，也就是说，看看所称的阴谋是否有可行性。小组就此注意到，联合国委员会在报告中谈到，SE-BDY 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期间，机上没有派驻特别警卫，因而“不能排除有人未经授权接近飞机、从事破坏活动的可能性”。另外，9月17日在 SE-BDY 上工作的瑞典飞机技师们在向正式调查活动提交的证词中说明，在他们去午餐休息的时间，有 1 至 1 个半小时，飞机无人照管；而且，其中一名机械师(Nils Arne Ohlsson)回忆说，他下午往飞机上装行李时曾注意到，能从飞机外部进入的前货舱的门没有锁上。

专家技术评估(弹道学和医学)

168. 小组利用技术专家提供的信息，评估了以下说法是否能得到科学证据的支持：造成 SE-BDY 坠毁的原因是 TNT 引爆(如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所述)或更泛泛地是飞机上的某种爆炸物爆炸。哈马舍尔德请教了联合王国的一位爆破工程专家 Daniel Perkins 少校，Perkins 评估认为，“用 6 磅 TNT 主炸药做成的临时爆炸装置只要放对了位置，则破坏 SE-BDY 的飞行控制绰绰有余。”Perkins 少校还评估了用下列各种办法引爆的可行性：甚高频对甚高频电波传输；起落架触发机械开关；射弹命令启动；气压开关以及定时装置。他认为，甚高频对甚高频传输对破坏者来说是一种最佳机制，因为他可以自己决定在什么地带引爆炸弹。

169. 小组曾利用 Max Frei-Shulzer 博士和 Nils Landin 的弹道学专家分析，来评估关于 SE-BDY 可能遭到空袭或空中威胁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见第 104 至 107 段)。小组要指出，上述分析也可应用到现在有关人为破坏假说的新资料的评估上。在上述分析中，Frei-Shulzer 博士通过检查 SE-BDY 残骸中炸弹、定时炸弹或外来子弹的痕迹作出结论说，可以“排除发生了来自空中或地面的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蓄意破坏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强调语气是后加的)尽管如此，Landin 后来对 Frei-Shulzer 博士的工作进行分析，质疑其结论的确凿性，小组此前评估这种质疑的证明价值为“中”。综合起来看，上述评估显示，虽然在 SE-BDY 残骸中没有探测到炸弹、定时炸弹或外来子弹的痕迹，但无法排除这类材料的痕迹逃脱了检测的可能性。

170. 关于进一步检测爆炸物痕迹的问题，据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所附“事件日志”的记载，SE-BDY 的残骸于 1962 年 8 月 22 日和 23 日“被挪出飞机库，埋在了恩多拉机场”，现在依然在那里。小组认为，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用化学检测的方式探测爆炸材料的痕迹，但 Frei-Shulzer 博士检查残骸时已将金属残骸和部件熔化，所以现在已无法开展进一步检测。此外，小组也没发现任何参考资料提到过像飞机残骸或这类材料在埋于地下 50 多年后再接受如此检测的事例，

特别是像 SE-BDY 残骸这样，材料已被切割成块、经过熔化、之后又被埋在沙土中。

171. 关于小组所掌握的医学-法律专家分析，小组要指出，三位卓著的病理学家 Rammer 博士、Busch 博士和 James 博士在 2013 年 7 月 24 日交给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中共同认为，他们可以作出结论认为，尸检报告中没有证据显示哈马舍尔德经受过爆炸或烟熏(见第 34 段)。

证明价值

172. 关于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的证明价值的总体评估，小组衡量了以下因素，认为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及据称依此作出的判断的证明价值为“弱”：前面提到的种种考虑，特别是文件的真实性；原件何在不明，也不知有什么人曾经见过原件或可靠的次级替代品；文件转手过程不明以及在飞机上放置和安装 6 磅炸弹的可能性问题；在当时那种大环境和状况中所能发生的事情；SE-BDY 无人守卫的时间；飞机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停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时有可能遭到介入的部位。

驻利奥波德维尔的外国使馆人员的参与

173. 1960 和 1961 年驻利奥波德维尔的联合国前行政官员 George Wood 向小组提供了情况，大意是说 SE-BDY 坠毁的原因是驻利奥波德维尔的罗马尼亚大使馆人员受克格勃指使而从事的蓄意暗杀。据 Wood 称，曾在利奥波德维尔恩吉利机场担任过空中交通调度员的 Peter Brichant 告诉他，该使馆人员 9 月 17 日早晨进入 SE-BDY，把一个爆炸装置安在了机头内。显然，其意图是在飞机收起起落架时引爆炸弹。不过，据说起飞时没能引爆，而是在飞机准备降落恩多拉机场、起落架打开时引爆了。Wood 援引的旁证是，刚果政府宣布罗马尼亚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据说随后就将其驱逐出了刚果。另外，Wood 还试图找人佐证他提供的情况，据说这些人是叛逃后当时住在美国的前克格勃人员。不过他在 2015 年 4 月 23 日给小组的信中说，他发信去联系，但没有一个人给他回音。

174. 关于如何评估这个信息，小组要指出，现在没有对所谈事件掌握第一手情况的人出来做旁证，上述信息只是 Wood 从 Brichant 那里听来的传闻。另外，在正式调查活动中曾约谈过 Brichant，但他却没有提到过 Wood 提出的那种说法。小组评估认为，Wood 迄今提供的资料虽然据称能证明是罗马尼亚大使馆的人员将炸弹安装在 SE-BDY 上面，但是其证明价值为“弱”。

据称属于 SE-BDY 残骸的物质材料

175. 1975 年，在刚果工作的瑞典籍前联合国工作人员 Hilfding Björkdahl 据称在 SE-BDY 坠机现场发现了一块金属板。有人告诉他，这块金属板是 DC6 上掉落的。他将这块金属板带回瑞典，之后交给儿子 Goran Björkdahl 保管。Björkdahl 以个人和志愿身份对 SE-BDY 坠机进行了广泛研究。在与他约谈时，他将这块金属板

交给了小组，以核证其相关性。这是一块质地很薄的金属板，约 43 厘米长，25 厘米宽，上有一些小洞。Björkdahl 怀疑这些洞是子弹或爆炸装置碎片击穿所致，这块金属板在靠近中间位置有 4 个彼此紧挨着的洞。

176. 除自行进行专家技术评估外，小组还请联邦调查局协助评价这块金属板的可靠性以及这些洞是否是由枪弹或爆炸物质破坏造成。联邦调查局借助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提供的咨询，评估了该物件的高分辨率照片。两个机构的意见是，这块金属板不是来自飞机。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调查结果是，虽然这块金属板看起来像铝，但不是飞机上的承载结构，也不太可能是飞机部件。左右两端附近的几排洞孔分布、排列不规则，直径小，也与飞机上的洞孔不符。这块金属板可能是用在工业上，而不是航空上。该铝板看起来质地厚，相对软，而且有明显的变形。在货车车厢或飞机的其他非结构性区域可能会使用此类材料，但该材料看起来更像是地面车辆使用的。

177. 小组的弹道专家评估后认为，这块金属板上的洞孔不是弹头穿透该材料所致。他的理由如下，首先，这些洞孔的直径与任何已知的 1961 年已有武器的口径不符。虽然有些军事弹药的子弹在弹头铅心中嵌入一个直径更小的坚硬“穿甲弹头”，但评估结论是，4 发子弹的“穿甲弹头”在如此近的距离内打穿 4 个洞孔，但弹头的其他部分却未造成明显损害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弹头会由于冲击力而变成碎片。其次，专家发现，这些洞孔的位置及它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与自动火器扫射产生的正常分布不符。从洞孔本身也没有子弹穿透特有的外观。

178. 另一名弹道专家是丹麦全国法证事务中心侦探督察兼枪支检验员 Egon Poulsen。经过对高分辨率图像进行评估，他同意小组成员的结论。他还特别评估了金属板上的洞孔(包括位置相近的 4 个洞孔)，他认为，这 4 个洞孔的位置看起来都是被“安排”好的，也就是说好像是经过测量确定的位置。这些洞孔看起来都不是子弹洞孔，即使位置非常相近的 4 个洞孔也不是。从大小和形状(以及它们的位置)而言，这些洞孔不像是子弹穿射造成的。

179.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评估认为，这块金属板不是来自飞机，丹麦专家则评估认为，该金属板上的洞孔不像是子弹洞孔。鉴于以上所述，小组评估认为，与证明飞机残骸上可能有子弹洞孔的这块金属板有关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无”。

纵火装置

180. 关于 SE-BDY 可能是遭到人为破坏而坠毁的其他新资料包括 1978 年 6 月 3 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提到的一篇调查文章，其中说，据称 1962 年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份中央情报局报告，其中写到“我们实地技术特工人员收集的证据表明，飞机上的爆炸装置属标准的克格勃纵火设计”。但除此短短一句话外就没有其他资料了。

181. 为评估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小组请美国政府查阅档案和记录，寻找能够说明存在所说的这份中央情报局报告及其依据的任何资料，或其可能掌握的能够为 SE-BDY 航班坠毁情况提供线索的中央情报局其他报告或相关资料。美国政府在 2015 年 6 月 9 日的答复中称，中央情报局未发现这份报告或有关这份报告的任何记录。此外，美国政府还称，查阅了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档案和记录后也未发现与所说报告有关的资料。

182. 在对该资料所述行动的可行性进行专家技术评估方面，炸药专家 Perkins 少校在写给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点燃纵火装置(而不是爆炸物质)在技术上是可能造成飞机失事的。他指出，此类装置中的自燃物质会点燃飞机，之后，飞机机体的铝合金和飞机燃油会使整个飞机起火。尽管如此，由于《华盛顿邮报》文章中的资料缺乏依据，也没有可以进一步检验该条资料的更详细资料，因此，小组评估认为，上文中提到的在飞机上安装纵火装置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无”。

六. 关于劫机的新资料

183. 联合国委员会在其调查工作中注意到“1962 年 1 月期间，一些国家的若干报纸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新闻，称第 17 个人为达到劫机目的在利奥波德维尔登上了飞机”。联合国委员会虽然指出，这条新闻“纯属谣言”，但还是“仔细调查了其是否属实”。在此方面，该委员会指出，联合国刚果民事行动团长 Sture Linner 博士和看到飞机在利奥波德维尔起飞的其他人都证实，他们认识登机的所有人，或是飞机起飞前有人向他们介绍了登机所有人。此外，联合国委员会引用了 Ross 大夫的评估结论，其中称残骸中还有第 17 具尸体是“极其不可能”的，而且警察勘察坠机现场时未发现乘客在灌木丛里走失的任何痕迹。

184. 小组发现了与 SE-BDY 遭劫机坠毁假设有关的两条新资料。第一条资料是，记者 David Pallister 在 1992 年 9 月 11 日发表的联合王国《卫报》一篇报道中提到，前法国军官、雇佣兵 Rene Trinquier 上校在“Notre Guerre au Katanga” (1963) 一书中声称，SE-BDY 班机在利奥波德维尔起飞前，一名劫机者被私自带进飞机(未指明被谁带进去的)。据称，该名劫机者奉命迫使飞行员改道飞往另一(具体不详)地点，阻止哈马舍尔德前往参加停火谈判。

185. 经评估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小组发现，找不到 Trinquier 上校这一言论的依据，也没有可以对照其他资料进行检验的其他细节。因此，小组评估认为，这条资料在帮助确定劫机者被私自带上 SE-BDY 班机方面，证明价值为“无”。

186. 另一条新资料是，《卫报》同一篇文章接下来写到坠机后不久，前联合国官员 George Smith 和 Conner O’ Brien 博士与韦伦斯基总理进行了讨论，O’ Brien 博士问坠机后发现了多少具尸体，据称韦伦斯基“露出他常见的灿烂笑容，仅仅

说了一句‘到底是 14 具还是 15 具?’”。《卫报》文章的作者在 Trinquier 上校的言论之后便立即引用该对话，看来是推测，韦伦斯基暗示 SE-BDY 班机上有可能“还有一名乘客”劫持了或企图劫持飞机。

187. 经过对据称是韦伦斯基所说的话进行评估，小组指出，这条资料属于传闻，没有可以核证此条资料的进一步细节，其依据也不清楚。此外，小组指出，根据联合国委员会(以及所有其他正式记录)，机上乘客数为 16 人，不是韦伦斯基所说的“14 或 15 人”。小组的评估结论是，这条资料在帮助确定“另有一人”登上了 SE-BDY 并劫持了飞机方面，证明价值为“无”。

七. 有关人为因素的新资料

188. 1962 年联合国委员会审议了 SE-BDY 坠机的四类可能原因中的“人的失误”的可能性，包括调查因飞行员丧失能力、使用错误的仪表着陆导航、误读高度表、飞行员注意力分散以及向 SE-BDY 飞行员提供误导或不完整信息等原因造成飞机坠毁的可能性。小组虽然未发现与这些问题本身有关的任何新资料，但的确收到了新资料，指出机组人员疲劳在坠机事件中可能起的作用。以下概述和评估了这条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小组谨强调，机组人员疲劳可能起的作用本身不成其为坠机原因，也不能解释在 SE-BDY 坠毁的各种可能原因内，疲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尽管如此，机组人员疲劳有可能从负面影响了机组人员对周围情况的判断以及应对和管理各种异常和紧急情况能力。这些异常和紧急情况包括遭到空中攻击或外部威胁、蓄意破坏、劫机或技术性故障等。

机组人员疲劳

189. 所有三次正式调查都信赖的一个看法是，飞机机长 Per Hallonquist 在事件发生当天完全能够胜任飞行任务，因此，在调查中大体可以排除疲劳是造成坠机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这些调查似乎基本忽视了机组其他人员的可能疲劳程度及其对整个机组的表现造成的影响。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在讨论有关证据时指出，SE-BDY 的飞行员 Litton 和 Arheus，9 月 16 日晚已承担过前往伊丽莎白维尔的飞行任务，而 Hallonquist 看起来很放松，而且“对承担此次飞行任务显得非常热切”。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则指出，Litton 上飞机时说“他很累”，而 Hallonquist “看起来神采奕奕，很放松。”联合国委员会指出，飞机上有 3 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至少其中 1 名飞行员在此次飞行之前已经休息了 24 小时，而且飞机上还有供飞行员睡眠的地方，因此“满意地认为，该事故不是飞行员疲劳所致”。

190. 1961 年 12 月 18 日发表的一篇由 Ulf Strid 编写的文件提供了新资料，这些资料分析了 SE-BDY 机组人员的飞行记录和飞行时间。分析依据的是泛航公司记录的飞行员 Hallonquist、Litton 和 Arheus 和飞行工程师 Willhelmssen 的飞行日志数据，并根据泛航公司的飞行业务登记册和相关集体协议对数据进行了核对。该

分析是 Ake Landin、L. Lindman 和 Torsten Nylen 署名的一份更长文件的附文。小组注意到, Landin 和 Lindman 分别是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委派的代表和该委员会的技术顾问。Strid 在文件中指出: (a) Hallonquist 在 9 月 13 日至 16 日期间未录入飞行时间, 而 Litton 和 Arheus 分别在 9 月 13 日和 14 日录入了 8.8 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9 月 15 日和 16 日未录入飞行时间; (b) 在 SE-BDY 坠机前 24 小时内, Litton 和 Arheus 在 24 小时内都已飞行了多达 16.8 小时(全部登记为夜间时间), 而 Hallonquist 飞行了 6.3 小时(全部为夜间时间)。

191. Strid 认为, 根据泛航公司的飞行业务登记册, 坠机前 24 小时内的飞行时间超时。Strid 指出“似乎 Litton 和 Arheus 不太可能在最后 24 小时内累积充足睡眠。” Strid 还指出, 同一时段, Hallonquist 似乎有适当休息的时间。飞行工程师 Willhelmssen 在之前 24 小时内也已飞行了多达 16.8 小时, 他在 9 月 17 日至 18 日之前的夜晚同 Litton 和 Arheus 在同一趟飞往伊丽莎白维尔的班机上。此外, Strid 还发现, 8 月 1 日至 9 月 17 日期间三名飞行员中一人或多人曾若干次超过飞行时限。Strid 还指出, 他仅仅分析了飞行时间, 未分析机组人员在岗时间(其中包括飞行前后的工作以及空中时间), 他说, 瑞典民航局“没有对此进行监测的义务”。

192. 坠机后应该对此进行了分析, 因为《芝加哥公约》规定, 作为登记国的瑞典有义务向事故发生所在地国(罗得西亚)提供“有关飞机和所涉机组人员的相关资料”。(《芝加哥公约》, 附录 13, 第 4.6 段)。

193. 其他新资料包括隶属于瑞典空军的一名前航空军医 Ake Hassler 大夫在 2015 年 5 月 12 日给小组的信函中通报, 他认为“1961 年 9 月的恩多拉坠机是一起普通的飞行员失误事故”。“1960 年代”, 瑞典国防部责成 Hassler 大夫调查所有的“瑞典飞行事故”, 其中就包括 SE-BDY 坠机事件。他在信函中继续写道, 他认为造成 SE-BDY 坠机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机组人员疲劳。他所指的疲劳是在飞往恩多拉前 36 小时睡眠不足, 甚至指出, 因此, 机组人员不适合承担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的飞行任务。Hassler 提供的其他资料包括 Bengt-Ake Bengs 编写的一份发表日期为 1966 年 9 月 29 日的文件, 其中包括援引和评论 Strid 整理的上述资料。Hassler 大夫声称, 瑞典当局未提请罗得西亚调查局充分重视这一问题。他接着指出, 他几次试图通过瑞典当局提请联合国注意这一问题, 但都遭到当局“阻止”。

证明评估

194. 即使在知识量比 1961 至 1962 年时多得多的今天, 疲劳对航班机组人员机上表现的影响仍是一个复杂问题。1970 年代后期, 大型商用飞机发生多起事故, 造成很多人丧生, 此后, 关于人的因素和组织因素及其对飞机事故所产生影响的研究猛增, 这一时代的研究开始侧重机组人员资源管理和指挥训练。但早在 1961

年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机组人员的身体状况必须适于执行飞行任务，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各种条件下安全驾驶飞机，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执行各种做法管理疲劳。

195. 国际民航组织对疲劳的定义是“因缺少睡眠或长时间处于清醒状态、生物钟紊乱或工作量(脑力和/或体力劳动)导致精神或身体机能下降的一种生理状态，可损害机组人员的警觉性和安全驾驶飞机或履行与安全相关职责的能力。”SE-BDY 是 DC6B 型飞机，当时是一架不容易驾驶的复杂飞机，要求至少由 3 名机组人员(2 名飞行员和 1 名飞行工程师)操控。飞机由多名机组人员操控时，机组所有人员必须团队作业，责任分工明确，交流准确无误，确保在任何时候都对周围情况有准确认识，并有能力对异常和紧急情况做出反应和应对。如果机组人员的工作状态受到了疲劳的负面影响，那么他们出现诸如口误、疏忽和错误等过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或出现视觉错觉或对周围情况丧失意识等情况。同样，这也会对机组人员应对和管理空中袭击或外部威胁等异常或紧急状况，或应付人为破坏或技术故障的后果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196. 小组认为，Strid 在 SE-BDY 坠机后开展这种分析不足为奇，因为《芝加哥公约》规定登记国(在此是瑞典)有义务向事故发生所在地国(罗得西亚)提供任何“有关飞机和所涉机组人员的相关资料”(《芝加哥公约》，附录 13，第 4.6 段)。相应地，在评估这条新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以评估其证明价值方面，小组请瑞典政府力求确认 Landin、Lindman 和 Nylenthe 认可的报告是否是仅供瑞典航空局内部使用，还是已提供给联合国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正式调查使用。瑞典政府一名代表非正式通报说，“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但小组注意到，在联合国委员会调查期间的问话中，Landin 对 Litton 和 Aerheus 在 SE-BDY 坠机前 24 小时内没有充足时间休息一说表示认同，并指出“这肯定[影响了飞行本身以及这两名飞行员的警觉性]，但影响程度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建议瑞典航空局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考虑并可以 Strid 的分析为依据。

197. 根据瑞典政府提供的其他资料，小组能够确定该文件作者 Strid 当时是瑞典民航局雇员，也是一名有资质的飞行员兼工程师。Hassler 大夫提供的文件包括 1967 年 4 月 20 日举行的听证会笔录。该笔录中写道，1963 年 2 月 1 日，Hassler 大夫被任命为瑞典空军兼职特别航空医师，隶属于 F21 飞行中队。笔录中还写道，1965 年 3 月 1 日起，Hassler 开始到瑞典 Malmslaet 的飞行管理研究中心工作。

198. 小组注意到，Strid 报告中概述的失事前 24 小时机组飞行时间与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同期有关 Hollonquist、Litton 和 Wilhelmsson 的数据相一致，但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记录 Arheus 之前的飞行时间为 10 小时 40 分钟，而 Strid 的记录是 16.8 小时。小组不确定为何会出现此种差异，因为罗得西亚民航调查委员会已经确认，此前的晚上 Arheus 也飞往了伊丽莎白维尔，因此录入的时间应该与 Litton 的一样。

199. Strid 指出，他的报告未分析瑞典民航局“没有监测义务的”在岗时间。虽然联合国委员会似乎根据小组已有资料，对照录入的实际飞行时间对疲劳对班机机组人员机上表现的可能影响进行了一些调查，但似乎极少或未分析能确定 SE-BDY 起飞前几天和数小时内休息的质量和数量的机组人员在飞行时间之外时间的休息时间和其他活动，也未分析可能对他们的机上表现产生负面影响的其他个人因素。这些进一步分析本可以更全面了解机组人员是否适合承担当晚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应指出的是，当今管理班机机组人员疲劳的做法更加全面，而且是基于风险，既包括机制监测，也包括机组人员自身监测，以确定机组人员是否能够胜任工作。

证明价值

200. 小组评估认为，在提供更多线索，帮助了解疲劳是否造成 SE-BDY 坠机的一个因素方面，Strid 提供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此外，Hassler 提供的资料为分析和评价 SE-BDY 机组人员的飞行时间提供了又一佐证。小组未得到其他旁证文件，如 Hassler 根据他声称的任务，同期记录的对 SE-BDY 坠机原因的分析。小组因此评估认为，在提供更多线索，帮助确定疲劳是否造成 SE-BDY 坠机的一个因素方面，Hassler 大夫提供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201. 但由于缺乏其他可能为这一问题提供线索的辅助证据，说明疲劳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坠机，很难将疲劳与坠机联系起来并解释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先生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SE-BDY 上未安装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当时《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与建议措施》的规定未要求安装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至于记录飞机坠机前特定时间区间空中飞行速度、高度、爬升或下降速度若干参数的飞行资料记录器，《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与建议措施》建议，像 SE-BDY 这样的活塞发动机飞机只有在“登记国要求”的情况下才安装此类记录器(国际民航组织附录 6 建议措施 6.3.2)。也没有要求必须在恩多拉塔台这样的所有有机坪控制服务陆空通话频道安装记录设施(国际民航组织附录 11 建议措施 6.1.4.3)。最后，除 Harold Julien 外飞机上再无其他生还的目击证人，而 Harold Julien 从飞机失事直到不幸去世，未提供任何有关机组人员上飞机前或飞行期间的信息，现在也很难再找到能提供准确信息的证人，说明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飞行之前机组人员的休息情况以及在执行飞行任务之外开展的其他活动。

八. 与官员和地方当局的活动有关的新资料

202. 联合国委员会调查并分析了坠机后地方当局的搜救行动，并发现“直至地面队伍在刚刚过了 1500B[恩多拉当地时间 1500 时]发现残骸后，才确定 SE-BDY 已坠机这一事实”。小组的理解是，这个地面队伍是由地方当局或安全

部队组成，而不是一个或多个在官方问询中作证说，自己于 9 月 18 日上午赶到坠机现场的平民。自结束那次调查以来，又获得了有关飞机最先被安全当局发现的新资料，小组将在这节对此进行审议，同时还将审议官员采取的与坠机有关的其他行动。

SE-BDY 和恩多拉塔台之间的无线电通讯

203. 小组查阅材料时注意到 1961 年 9 月 18 日英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的一封电报。Alport 勋爵在电报中报告称“推定哈马舍尔德搭乘的从利奥波德维尔起飞的飞机从上空飞过，但未降落，也未通话联络”(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2013 年 1 月 24 日，前英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 Denzil Dunnett 在提交给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回忆录“*To Katanga and On*”(1976)中提供了新资料。Dunnett 说，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晚某个时间，他无意中听到 SE-BDY 和恩多拉控制塔之间的无线电电话(具体时间不详)。SE-BDY 在通话中称，该架飞机将于 15 分钟内在恩多拉降落。小组审议了这条新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确定，官员试图掩盖 SE-BDY 和恩多拉控制塔之间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夜里进行了无线电联络。小组在此方面的评估认为，这条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设定高度不正确

204.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里，瑞典陆军中士 Ingemar Uddgren 驻守在加丹加 Kamina 空军基地，根据其回忆录(日期不详)中提供的资料，当 SE-BDY 首次与恩多拉控制塔通话时，该控制塔报告给 SE-BDY 的 QNH(设定高度)会导致飞机在准备着陆时的下降高度过低，以致出现危险。当晚半夜前后，Uddgren 中士正在 Kamina 空中交通管制塔值班。他自称听到了飞机无线电话务员 Carl Erik Gabriel Rosén 和他在 Kamina 控制塔同事之间的通话。SE-BDY 让 Kamina 核对恩多拉控制塔给出的 QNH。Kamina 的控制员确定，传给 SE-BDY 的 QNH 设定不正确，并努力将此信息通报给 SE-BDY，但无法再次取得联系。他之后深表忧虑地向 Uddgren 中士表示，使用那个 QNH 将导致 SE-BDY 下降的高度过低。

205. Kamina 机场当时由联刚行动的部队控制，被定为紧急改道时使用的一个备降机场。出于这一原因，讲瑞典语的无线电话务员 Rosén 在 SE-BDY 飞机上。他的作用是与 Kamina 机场建立无线电联系，而空中交通管制员也是瑞典人，因此，两个机站可以在非瑞典话务员听不懂的情况下交流信息。据称，Kamina 空中交通管制员了解恩多拉机场的飞机降落程序信息。

206. 在对这条资料进行评估时，小组质疑为什么当 Kamina 人员意识到出现错误时，看来没有立即通报联合国官员，既然没有通报，为什么此后也没有告诉其他正式调查或联合国委员会。小组评估认为，在帮助确定恩多拉控制塔向 SE-BDY 机组人员发出了错误的设定高度方面，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为“无”。

向加丹加运送 Fouga Magister 型喷气式飞机

207. 2013 年 6 月 27 日,前中央情报局军官 David Doyle 在接受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约谈时指出,1960 年代初期,他是一名在加丹加活动的中央情报局军官。当时在一次“机场例行检查”期间,他发现美国机组人员半夜从加丹加的美国商用飞机 KC97 上卸载 3 架 Fouga Magister(未说明具体地点),当时是 1961 年 7 月的某一天。他说,Delotervang 上校签收了这些装备,但 Delotervang 上校的隶属部队不清楚。他接着说,据称这些 Fouga 飞机是法国送给中央情报局帮助对抗联合国在加丹加行动的,后来又在这些飞机上安装了枪炮。他猜不出到底是莫伊塞·冲伯、法国还是比利时购买的这些飞机,也不知道驾驶这些飞机的是法国还是比利时的飞行员。哈马舍尔德委员会评估认为,在与 Doyle 讨论期间,他的部分回忆很“零散”,小组指出,这反映在向其提供的陈述中,Doyle 的回忆在其中有时候前后不一。

208. 小组指出,资料中没有任何依据断言飞机是“法国人”、中央情报局或指认的任何其他来源提供的。尽管如此,小组虽然考虑到缺少佐证资料,使该资料只有唯一一个证人,但评估认为在帮助确定,在 SE-BDY 坠机前向加丹加部队提供了 3 架 Fouga 喷气式飞机方面,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密码机被动了手脚

209. Crypto AG 是瑞士一家制造 CX-52 型密码机的公司,哈马舍尔德访问刚果全程使用的都是该型号密码机。现已故去的该公司创始人 Boris Hagelin 的妻弟 Sixten Svensson 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解释称,Hagelin 告诉他,这台机器和其他一些机器一样在设计上被动了手脚,使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只有制造商和情报机构本身才知道的其他选定情报机构可以秘密接收其发报。Svensson 向该委员会解释称,根据这台机器的设计,“对于 1961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与纽约联合国之间的通信,联合国读到的那一刻,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也可以一览无遗。”据称这是“Boris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指的是,在将密码机卖给用户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以及可能还有其他机构能够接收到解码电报。Hagelin 显然已将这一内容写入了计划最早于他死后 50 年,即 2033 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

210. 虽然可能存在这一拦截能力,但迄今对联合国记录和其他档案的搜寻工作均未发现飞行期间发出或接收了任何电报。但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事件发生后几天加丹加联合国办事处和联合国总部之间的信息往来如果被拦截,可能有关行程和哈马舍尔德与冲伯会谈其他安排的资料已遭泄露。关于哈马舍尔德访问期间通过 CX-52 型号密码机发出的信息可能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和据称的其他情报机构拦截的问题,小组评估认为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当局确定坠机现场的时间之一

211. 罗得西亚当局报告于 1961 年 9 月 18 日 1510 时(当地时间)最先确定了 SE-BDY 残骸地点。但质疑该说法的新资料指出, 共有 6 名新证人报告称, 他们在 9 月 18 日早些时候到了坠机现场(Chimema、Custon Chipoya、Lumiya Chipoya、Mast-Ingle、Mwebe 和 Mwansa), 发现现场已有警察或士兵, 或警察和士兵都有。这与罗得西亚政府官员当天晚些时候所说的安全部队最早发现残骸的时间是 9 月 18 日 1510 时(当地时间)的说法不符。

212. 以下概述了到过现场的 5 名目击证人看到情景。第一个目击证人(Custon Chipoya)说, 他在清晨左右到达坠机现场, 当时现场有警察和士兵。这名目击证人还说, 哈马舍尔德的尸体连同飞机碎片已被运走。第二个目击证人(Mwebe)说, 他是在 9 月 18 日 0600 时至 0700 时期间到达的现场, 他注意到现场有警察和士兵。他还说, 哈马舍尔德的尸体在一个蚁山附近。第三个目击证人(Mwansa)说, 他是在大约 0700 时到达的坠机现场, 看到现场有警察。他说现场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而且死难者的尸体已被运走。第四个目击证人(Chimema)说, 他是 0900 时到达的坠机现场, 看到现场有警察。他注意到飞机残骸还在着火。第五个目击证人(Lumayi Chipya)回忆说, 坠机后不久她就到了现场, 当时她注意到现场有警察和士兵。

213. 第六个目击证人(Wren Mast-Ingle)在给 Williams 博士的陈述中更全面地叙述了他赶到坠机现场的情形。他说听到 SE-BDY 坠机时他正在附近骑摩托车赶路, 他很快到达了现场(也可见第 94 段)。他对 Williams 博士说, 在他到达现场的同时, 也有 6 到 8 个身穿作战迷彩服的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到达了现场。据称, 这些人让他走开。这名证人还说, 飞机残骸没有被烧过。

214. 尽管这些证人抵达坠机现场的时间不同, 但其中一些证人说, 他们无法太靠近残骸, 因为警察或其他安保人员不让他们靠近(Custon Chipoya、Mast-Ingle 和 Mwansa), 靠近太危险, 因为残骸还着着火(Ngongo、Mwebe、Chimema)或者当时烟雾太大。

215. 但在 6 名新目击证人中, 3 人有关死难者尸体被运走以及现场被封锁的方式和时间的表述与他们声称到达现场时有关坠机现场状况的其他已知事实不符。这表明, 其中一些证人实际上可能是 1510 时后到达的现场, 因为届时复原和调查工作已在进行中。其中一个证人(Custon Chipoya)提到“飞机碎片”被运走, 这可能是因为飞机的很大一部分已在坠机过程和大火中毁掉, 因此看起来似乎飞机的部分残骸已被运走。

216. 根据定义, 这些新目击证人的叙述都不是在事件发生时期提供的。此外, 小组在第 62 至 66 段概述的影响目击证人资料证明价值的一般性因素也适用于此处所述这些新目击证人提供的资料。小组评估了这些新目击证人提供的资料在多

大程度上有助于确定，当局发现残骸的时间是在其正式说法中记载的 1510 时之前，认为 2 名目击证人(Chimema 和 Lumayi Chipoya)所提供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另外 4 名目击证人(Custon Chipoya、Maste-Ingle、Mwebe 和 Ngongo)所提供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当局确定坠机现场的时间之二

217. 坠机发生时，前英国外交官 Brian Unwin 是 Alport 勋爵的助手。2012 年 12 月 12 日，他接受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约谈。他指出，他和 Alport 勋爵乘飞机从恩多拉抵达索尔兹伯里时，Landsdowne 勋爵告诉他们“一架飞机失事了，他们发现了失事飞机，哈马舍尔德死了。”9 月 17 日至 18 日，Unwin 陪同 Alport 勋爵前往恩多拉，他估计，他和 Alport 勋爵是在 1330 时至 1500 时(当地时间)之间到达索尔兹伯里的(他记忆中各个事件的时间差异很大，后来的回忆更接近于官方看到残骸的时间)。因此，他的话表明，他和 Alport 勋爵是在当局的正式说法所述发现坠机现场的时间，即 1510 时之前获悉已发现了坠机现场。Alport 勋爵在他题为‘The Sudden Assignment’ (1965)的一书中也回忆称，一到达索尔兹伯里就听说确定了坠机现场。他回忆称，到达时间是 1400 时(索尔兹伯里当地时间，与恩多拉时间一样)，但小组无法确定他是从哪里知晓这一时间的。联刚行动代理主管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说，“根据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馆当时在恩多拉的空军随员向大使馆发回的直接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在距离机场东北方向约 7 英里的位置发现了一架飞机残骸，地面队伍正赶往现场”(S/4940/Add.4)。小组无法从该报告中看出哪里说明这些官员是在 1400 时确定的坠机现场。

218. Alport 勋爵和 Unwin 说他们获悉发现坠机现场而且哈马舍尔德已死的时间与当局首次发现残骸为当地时间 1510 时的官方说法不符。这似乎表明，Landsdowne 勋爵是在罗得西亚当局(或任何其他当局)官方说法所述发现残骸的时间之前就知道飞机已经失事，而且哈马舍尔德已死。在评估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时，小组注意到有关人员位高权重，他们很可能了解搜救工作的最新情况。但这条资料不是在事件发生时期提出的，而且考虑到可能存在官方串通问题，这条资料仅仅表明官员们掩盖了坠机现场是在 1510 时(当地时间)之前发现的事实。小组评估认为，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当局确定坠机现场的时间之三

219. 飞机失事时，Ian Colvin 是驻恩多拉的一名外国记者，他在‘The Rise and Fall of Moise Tshombe’ (1968)一书中写道，9 月 18 日 0900 时(当地时间)，他自己驾驶飞机飞过失事现场。他称看到树林中有一条狭长的倒伏带，警察正在飞机残骸和灰烬中走来走去。这比官方声称发现残骸的时间早了几个小时。Colvin 称并未

通报任何人。小组经过评估认为，关于看到 1961 年 9 月 18 日上午坠机现场有警察的说法，这条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一家外国情报机构的报告

220.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向小组提供的新资料中有一条是英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署的一等秘书 Neil Ritchie 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提交的一份解密报告。据称他当时也是军情六处的一名特工。他在报告中详述了当天早上他如何将莫伊塞·冲伯和英国驻伊丽莎白维尔参赞 Denzil Dunnett 运送到恩多拉，之后在恩多拉等待从利奥波德维尔前来的哈马舍尔德。虽然这份报告并未提及 SE-BDY 坠机的可能原因，但报告本身和报告内容提供的新资料说明该地区有英国情报人员，而且该情报人员报告了与 9 月 17 至 18 日夜里哈马舍尔德活动有关的周围情况。此外，Williams 博士向小组提供的新资料说明，出于安全保密原因，联合王国政府保留了可能与所述事件有关的部分政府档案和记录。

221. 在此方面，为协助评估这条资料以及其他新资料的证明价值，小组请联合王国政府主管部门查找并向小组提供他们掌握的 Ritchie 或其他情报官员有关这次死难事件的任何资料或任何其他相关材料。此外，小组请该主管部门向小组提供 Williams 博士提请小组注意的被保留的那部分记录(见附录 7)。

222. 联合王国政府在 2015 年 6 月 10 日的回信中说，联合王国与这些事件有关的绝大部分材料已经解密，并已向公众公开，而且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已协调在联合王国所有相关部门查找，但任何部门都未发现任何相关材料。信中还说，经过委托审查所有有关保留材料，以确定现在是否可以公开，审查认定，出于安全相关原因，联合王国政府现在还不能公开任何保留材料。信中还说，保留内容是公开文档中的个别字词，而且保留的全部内容很少，仅有几个字(见附录 7)。

九. 主要结果摘要和结论

主要结果摘要

关于死因或据称的其他人为死因的新资料

223. 小组认为 2005 年公布的关于哈马舍尔德受了枪伤、前额上有一个圆洞的资料的证明价值是“无”。坠机前后都没有发现关于他受了枪伤的医学证据。法医的一致意见是，他立即(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或在撞击发生后几秒钟内(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和 Knudssen)丧生，或在撞击后存活的时间很短(Ranner、Busch 和 James 三位博士)。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小组分别咨询的外部法证专家支持 1961 年 Ross 大夫、Stevens 大夫和 Smith 大夫进行的尸检的正确性。

224. 一名目击者提供的表示 1961 年 9 月 18 日哈马舍尔德在坠机现场仍活着、生命垂危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无”。

225. 新增加的关于两名雇佣兵(Swanepoel 和 Colin John Cooper)在坠机后枪击哈马舍尔德的指控缺乏证明价值。

226. 在邓迪大学档案所藏 Ross 博士的记录中,有空难所有死难者的 200 份原始 X 光片和在事件当时记录的“联合国飞机空难死难者病理检查结果分析”,而且安大略首席法证病理学家办公室 Smith 博士档案中有根据《验尸法》出具的同样包括所有死难者在内的正式尸检报告的复印件,这两套材料经确认存在,从而加强了北罗得西亚当局进行的原始尸检的报告的真实性和恰当性。

关于 SE-BDY 飞行最后时刻的新目击证人提供的资料

227. 小组认为,在帮助确定下述一个或多个情况方面,12 名新目击证人中 9 人所提供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 a. 在 SE-BDY 将要抵达恩多拉的同时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
- b. 在 SE-BDY 将要抵达恩多拉的同时在空中的其他飞机系喷气式飞机。
- c. SE-BDY 在撞击地面之前已着火。
- d. SE-BDY 在将要抵达恩多拉时被空中的其他飞机击中或猛烈进攻。

228. 认定这一证明价值的根据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影响目击证人观察可靠性的因素,但这些资料是目击证人对确信是自己所见(或所闻)的情况的第一手叙述,并且增加了向历次正式调查所提供的证人叙述的分量。

关于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的新资料

229. Charles Southall 和 Paul Abram 声称,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夜间,他们听见拦截的据其认为是有关对 SE-BDY 的袭击并导致其坠机的无线电通话或读到其抄录,小组认为他们所述经过的证明价值为“中”。虽然从技术的角度说,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在 Southall 和 Abram 分别所属的塞浦路斯和希腊监听站很有可能拦截或转发了无线电通讯,但其说法的真实性仍有待美国政府加以证实。此外,美国政府在 2015 年 6 月 9 日一封信中已通知小组,对其文件和记录的查找没有发现与小组关于此事的要求相符合的文件,并且查找工作包括对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记录的搜索(见附录 6)。

230. 关于一位新的目击者所称 SE-BDY 的残骸布满弹孔的资料,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弱”,根据是与其他已知的关于当时情况的资料不一致。但是,小组同意,他可能是在飞机残骸还没有起火的部分看到的弹孔。

231. 对于第二个证人关于 SE-BDY 残骸上有弹孔的说法,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是“无”,根据是这一信息只是传闻。

232. 对于法国外交官 Claude de Kemoularia 关于他于 1967 年在巴黎约谈了一个名叫 “Beukels” 的比利时雇佣军飞行员、后者据称承认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晚在试图使 SE-BDY 改变飞行路线时无意击落了飞机这一说法, 小组认为该资料的证明价值为 “弱”。认为其证明价值为 “弱” 的根据是, 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任何关于 de Kemoularia 试图将所指称的情况报告有关当局的材料; 显然没有 de Kemoularia 在约谈时或约谈刚结束同时记录的笔记; 比利时和法国政府给小组的答复, 其中称他们的文件和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资料。

233. 对于指控据称是雇佣兵的 Van Risseghem 和 Andre Gilson 两人参与此事的资料, 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是 “无”, 根据是当时有关当局(分别是比利时政府和联刚行动)进行的调查能够确定他们人在何处, 表明他们不可能涉及对 SE-BDY 的空中袭击。

234. 对于传说中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Roland ‘Bud’ Culligan 受中央情报局命令击落 SE-BDY 的说法, 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 “弱”。认为其证明价值 “弱” 的根据是, 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Culligan 的资格和对事件的陈述, 包括所称他在日记中的详细描述, 而且美国政府对小组要求提供资料的回复称, 在关于当时中央情报局活动的记录中查不到 Culligan(见附录 6)。

235. 对于一名记者偷听到两名比利时飞行员(其中一个叫 Delin 少校)酒后吹嘘他们在一次空中袭击中迫使 SE-BDY 坠落的说法, 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是 “无”。认为无证明价值的根据是, 报料人明知他应该在罗得西亚委员会的聆讯上作证, 让他的说法充分接受检验, 但他仍不愿意这样做; Delin 少校向罗得西亚调查委员会断然否定他说过这样的话。

236. 对于记者兼作家 Eva Aminoff 的合伙人关于两个姓名不详的比利时飞行员接受命令击落 SE-BDY 的说法, 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是 “无”, 根据是这一信息只是传闻, 与事件不是同一时期的, 并且没有任何详细资料可与其他资料对照检验。

237. 对于那些寻求支持在对 SE-BDY 的空袭中使用了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De Havilland Dove 或 Dornier DO-27 或 DO-28 飞机等说法的资料, 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 “弱”。这些资料只提及飞机能力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有人已根据运行和其他限制提出了几项质疑。

关于人为破坏的新资料

238. 关于 1998 年 8 月 19 日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据说是南非海洋研究所下发的下令进行以 “除掉” 哈马舍尔德为目标的 “塞莱斯特行动” 的文件, 其证明价值为 “弱”, 主要原因是其真实性无法确定; 文件过手链条不确定; 不能证明 1961 年 9 月南非海洋研究所是否存在, 即使其内容涉及在 SE-BDY 上安放

6 磅炸弹的指示，而且在飞机停在利奥波德维尔一个或一个多小时无人看守的情况下存在这种可行性。

239. 2015 年关于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外国使馆(罗马尼亚)工作人员涉及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当 SE-BDY 停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停机坪时在机上安放爆炸装置，原因仅仅是该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据称在当天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的说法，其证明价值是“无”。

240. 1975 年一名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坠机现场发现的可能成为物证的一块金属的证明价值是“无”，原因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曾对其作出评估，认为很可能不是从飞机上掉落的；关于金属片上的洞，丹麦弹道学专家认为这些洞的大小和外观没有子弹穿透的特征。

241. 1978 年 7 月 3 日发表的一篇报纸文章中关于 SE-BDY 上的爆炸装置属于“克格勃的标准燃烧弹设计”的说法缺乏资料来源、真实性和可验证的细节，被认为证明价值是“无”。

关于劫机的新资料

242. 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一名劫机者在 SE-BDY 离开利奥波德维尔之前被偷偷送上飞机以迫使其改变路线、飞往不明地点，从而阻止哈马舍尔德与冲伯按计划恩多拉举行停火谈判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无”。

243. 两名前联合国高级官员提供的关于在空难发生后不久，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前总理罗伊·韦伦斯基暗示 SE-BDY 机上可能有一名“额外”乘客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无”，原因是这一信息只是传闻，缺乏细节，空难事件发生后飞机上所有 16 名乘客的身份立即得到确认，而且关于这样一项冒险行动的可能性有一系列未得到回答的问题。

关于人的因素的新资料

244. 关于据报四名机组人员中有三人在 SE-BDY 坠毁前 24 小时内已飞行长达 16.8 小时，几乎整夜飞行，因此似乎没有足够的机会得到适当休息的资料，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中”。这一资料是在瑞典有关当局任职的合格工作人员根据 SE-BDY 的运营公司泛航航空公司的记录在当时进行的分析。

245. 对于另一个来源提供的同样指称机组人员由于飞行时间过长而产生疲劳的资料，小组的评估认为其证明价值为“弱”，根据是资料是二手来源提供的，没有向小组提供报料人按照其称任务对 SE-BDY 坠机所做分析的同期记录。

关于官员和地方当局活动的新资料

246. 两名目击者提供的关于北罗得西亚当局在官方说法所述 1510 时之前发现了飞机残骸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247. 一名在 SE-BDY 坠机后不久曾到过现场的目击证人提供新资料, 称在那里看见 6 至 8 人身着作战迷彩服, 可能是军人或警察。这项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因为除了其他考虑因素之外, 它引起了对这一事实的质疑: 空中搜索队一名队员首先看到坠机, 报告在空中发现了残骸, 它还引起了对北罗得西亚当局官方说法的质疑, 即警察在 1510 时左右到达坠机现场。

248. 1995 年 Alport 勋爵送交的新资料称, 他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 1400 时到达索尔兹伯里时, Lansdowne 勋爵向他告知, 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已被发现, 哈马舍尔德已经遇难, 这一时间先于当局提供的发现残骸的官方时间。这一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249. 驻扎在加丹加省由联刚行动控制的 Kamina 空军基地一名前陆军中士提供的新资料称, 恩多拉控制塔台向 SE-BDY 发送了错误的 QNH(设定高度), 可能导致飞机下降至危险的低空, 这项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是“无”, 因为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这一观点之前, 他从未向联合国或他所属的部队派遣国报告过此事。

250. 关于宣称在哈马舍尔德访问刚果期间使用的 CX-52 密码机发送的通信被情报机构拦截的新资料, 小组认为其证明价值为“中”, 这条资料的依据, 是生产这部机器的瑞士公司 Crypto AG 创始人的妻弟于 2013 年 3 月 6 日提供给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初步资料。

结论

251. 关于哈马舍尔德及部分随行人员罹难的可能原因的全部新资料及其证明价值并没有减损原来对 SE-BDY 乘客所做尸检的适当性、结果和结论。

252. 小组认为, 如果大会同意对此事做进一步的调查, 让住在赞比亚的未亡证人再接受质询不会有什么收获。他们的证言现在既然已成为联合国正式记录的一部分, 仍将随时可用来与现有的资料和今后可能发现的任何新资料进行对照检验。

253. 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建议, 重启联合国委员会 1961-1962 年调查的初步目的, 是根据所披露的关于对通讯进行侦听的记录, 证实或反驳显示 SE-BDY 是因遭到某种形式袭击或空中威胁而坠毁的证据。特别是, 该委员会认为小组必须要求美国政府披露国家安全局报告的“符合”委员会的要求、但因其保密级别而仍免于披露的两份文件。小组一名成员被允许全面查阅这两份“符合要求的”文件, 认为文件所载信息对于确定关于坠机原因或空难的一个或多个原因的事实没有帮助。小组成员还认为, 这两份文件没有任何关于侦听到有关袭击 SE-BDY 的通讯的信息。尽管小组要求某些会员国提交其他具体资料, 但作出答复的会员国通知说, 他们无法找到符合要求的文件。然而, 这是小组认为仍未穷尽的一条调查线路。

254. 自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作出结论以来，一些雇佣兵或其对话者以及其他特工提出了几个关于他们在一次空袭中击落 SE-BDY 或以其他方式迫使其坠落的说法。小组收到的关于此事的大部分新资料缺乏可信度。

255. 根据小组在任务期间所审查的资料，似乎联合国的资料来源可能低估了 9 月 17 至 18 日事件发生时加丹加省可用的资源数量，包括关于使用中的飞机的数目和类型。然而，关于 Fouga Magister、De Havilland Dove 以及 Dornier DO-27 和 DO-28 飞机的资料仅涉及这些飞机发起空袭或威胁的能力。这些资料对于支持在事件的当夜这些类型的飞机中有一架实际参与了对 SE-BDY 的空袭或威胁的说法没有帮助。

256. 关于宣称 SE-BDY 可能受到安装或安放炸药或其他此类燃烧装置破坏的说法，全部有关新资料提供的支持很弱。

257. 经过小组的集体审查，关于劫机的全部新资料及其证明价值既不支持也没有加强关于 SE-BDY 在从利奥波德维尔飞往恩多拉的途中可能被劫持的假设。

258. 关于一国或多国或其官员可能官方串通一事，小组收到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同时，鉴于在这方面存在未能解答的问题，它也不能排除或消除这一可能性。

259. 虽然联合国委员会对于疲劳对机组人员表现的影响有一些考虑，但是，按照当代调查标准来说根据不足。然而，机组人员疲劳可能产生的影响本身不足以解释坠机的原因，也不能解释疲劳如果起了作用的话，在关于可能原因的一种或多种假设中，能在何种程度上促成 SE-BDY 坠机。

260. 从整体上考虑，除了所发现的主要和次要医学材料，新资料只得到物证的微弱支持。

261. 部分关于空中袭击或威胁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被认定为“中”，这些资料中目击证人的陈述也可能为追寻关于空难和死难事件的可能真正原因或多重原因提供明显的线索。这些目击证人的陈述包括：他们观察到在 SE-BDY 将抵达恩多拉的同时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或喷气式飞机，SE-BDY 在撞击地面之前已经起火，或者 SE-BDY 被空中的其他飞机击中或猛烈进攻；两名目击者据称听到关于这起事件的无线电通信或看到无线电通话的抄录；新出现的关于 1961 年加丹加省政府的空中能力及其外国军事和准军事人员使用情况的更多资料。

十. 建议

262. 小组提出如下建议：

(a) 小组注意到载有与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有关的资料的记录和档案，包括死难者的原始 X 光片和尸检报告、病理

分析和图解以及其他重要的医学资料等主要和次要材料，由私人 and 公共档案机构所藏，存放在各个国家(加拿大、瑞典和联合王国)和机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瑞典国家档案馆、安大略首席法证病理学家办公室、瑞典皇家图书馆、邓迪大学和联合国秘书处)中。小组建议秘书长与藏有此类档案的会员国、机构和个人合作，探索设立一个集中的档案机构或其他整体性安排，使联合国和其他受权方以电子手段或其他适当手段查阅这些记录和档案，以期确保它们继续得到更好的保存和查阅。

(b) 小组建议秘书长继续敦促会员国披露、解密或特许秘书长查阅他们可能掌握的与罹难的情况和环境有关的资料。在这方面，小组邀请秘书长采取后续行动，处理小组要求会员国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具体资料方面的未尽事宜。

(c) 小组建议，以小组的主要结果和结论为指南，在秘书长从会员国或其他来源收到能增加目前已有的资料的证明价值的新资料时，秘书长或他认为有必要成立的独立机构应集中协调地审查该资料在何种程度上能确定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小组进一步建议秘书长向大会报告新资料及其审查的结果，包括改变了本报告或联合国委员会考虑的资料证明价值的审查结果。

263. 为了最终揭示关于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情况和环境的全部真相，仍需要联合国持续不断和作为一个优先事项，进一步认真填补依然存在的资料空白，包括在会员国及其机构持有一些机密材料和资料，能够进一步揭示这起死难事件及其可能原因或多重原因的情况下填补资料空白。

专家小组组长

Mohamed Chande Othman(签名)

成员

Kerryn Macaulay(签名)

成员

Henrik Larsen(签名)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01

8 April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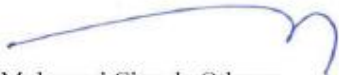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entit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sulting in the tragic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Furthermore, I have the honour to recall the announcement of His Excellency, the Secretary-General, that he has, in accordance with operative paragraph 1 of resolution 69/246, appointed an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In my capacity as Head of the Panel, I a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ogether with its other members, Ms. Kerry Macaulay (Australia) and Mr. Henrik Larsen (Denmark), the Panel has commenced its work as of 30 March 2015. Furthermore, I wish to advise that the Panel is scheduled to submit its finding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in 10 weeks.

Further to operative paragraph 2 of resolution 69/246 and the Secretary-General's note verbale of 19 January 2015 encouraging Member States to provide him with any relevant records or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session, the Panel invites Member States to share any such records or information with it. Member States may contact myself or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Panel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Please accept, Your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His/Her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04

23 April 2015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the mandate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addition,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the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Belgium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dated 25 March 2015, advising that the competent Belgian authorities are undertaking a search of their records for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tragic incident. Furthermore, I wish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all Member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dated 8 April 2015, inviting their Excellencies to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relevant records or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session, pursuant to the request set out in operative paragraph 2 of resolution 69/246 and by His Excellenc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verbale of 19 January 2015.

Further to those general requests, and having now reviewed the new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esently available to the Panel more closely, the Panel would like to add the following more specific requests related to material potentially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its work. Several sources make reference to the presence of Belgian nationals operating as pilots for, or otherwise supporting, Kataganese forces in and around Congo, in 1961, including an individual referred to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as "Beukels". Other such individuals about which new information has come to light include a Mr. Vak Riesseghel (possibly a misspelling of Jan van Risseghem), referred to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 a cable from Leopoldville dated 18 September; as well as Messrs. Andre Gilson, Carlos or Charles Huyghe, 'Major' Delin, Jose Magain, Jerry Puren and 'Colonel' Lamouline.

To enabl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is new informa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Belgian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se individuals in the Congo or Northern Rhodesia (now Zambia) during 1961, as well as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inquiries into the assassination of Patrice Lumumba and the activities of Fouga jet aircraft

Her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Belgium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in and around Katanga during the time in question. Furthermore,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Belgian authorities to search for and share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and past records and other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be able to declassify and share with the Panel.

In addition, as part of the Panel's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work, one of its members, Mr. Henrik Larsen, will visit Brussels on 4 and 5 May in order to visit the State Archives of Belgium and meet with Belgian resource persons. In anticipation of that visit,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a search of the State Archives of Belgium for information of potential relevance, including that relating to the roles of Belgian mercenaries in Congo, in particular in Katanga Province, and the Belgian mining company Union Minière (now Umicore), during 1961.

The provision of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it be located, would greatly assist with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The Panel may be contacted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Government's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présentation Permanente du Royaume de Belgique
auprès des Nations Unies

One Dag Hammarskjöld Plaza
885 Second Avenue, 41st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Tel: +1(212)378 63 00
Fax: +1(212)681 76 18
Mail: newyorkun@diplomatie.fed.be
www.diplomatie.be/newyorkun

Réf.: NYK UNO/JUR.01/NV/KC/2015/223

CONFIDENTIEL

Annexes : 2

L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de la Belgique auprès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résente ses compliments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et a l'honneur de se référer à la note verbale 2013-OLC-000840 du 23 janvier 2015 concernant « L'Enquête sur les conditions et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mort tragique de Dag Hammarskjöld et des personnes qui l'accompagnaient ».

L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de la Belgique auprès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a l'honneur de transmettre, en annexe et en complément à la note NYKUNO/JUR.01/NV/AMR/2015/180 du 22 avril 2015, une copie...

1. d'un télégramme de feu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ag HAMMARSKJÖLD à fe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belge, P.-H. SPAAK, daté du 16 septembre 1961.
2. d'une « Note pour le dossier Van Risseghem » émanant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tée du 20 septembre 1961 et complétée à la main le 22 septembre 1961. Cette note montre que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 mené une enquête, avec le concours de la Sûreté belge, au sujet de M. Jan VAN RISSEGHEM, dès réception du télégramme de feu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ag HAMMARSKJÖLD. L'enquête a indiqué que M. VAN RISSEGHEM se trouvait en Belgique du 8 au 16 septembre 1961 et qu'il ne pouvait donc pas être le pilote incriminé par feu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ans les attaques aériennes contre les forces des Nations Unies au Katanga. La note donne une information manuscrite de dernière minute (22 septembre 1961) émanant de la Sûreté belge : « [...] le pilote du Fouga Magister est de nationalité britannique. En tous cas quand le F.M. a mitraillé l'avion Sabena sur la plaine d'Eville et l'avion ONU ultérieurement utilisé par Monsieur H., VAN RISSEGHEM était en Belgique 8 au 16 septembre [...] ». Cette phrase indique que l'avion utilisé par feu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avait été précédemment mitraillé, ce qui expliquerait les traces de balles relevées sur l'avion, après l'accident qui lui a coûté la vie ainsi qu'à plusieurs autres personnes.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New York

/...

Au sujet de l'assassinat de M. Patrice LUMUMBA, l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de la Belgique auprès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réfère à l'enquête parlementaire menée en 2001 par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de Belgique visant à déterminer les circonstances exactes de cet assassinat et l'implication éventuelle de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belges dans celui-ci. L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de novembre 2001, est disponible au lien Internet suivant :

http://www.lachambre.be/kvvcr/showpage.cfm?section=%7Ccomm%7Clmb&language=fr&story=lmb.xml&rightmenu=right_publications

Enfin, l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de la Belgique auprès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a l'honneur d'informer que Mme Christine SOMERHAUSEN, *conseiller-adjoint*, a été désignée comme personne de contact pour le dossier d'enquête sur la mort tragique de M. Dag HAMMARSKJÖLD au sein de l'administration du Service public fédéral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Bruxelles (christine.somerhausen@diplobel.fed.be, tél. : +32.(0)2/501 86 37).

Le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de la Belgique auprès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saisit cette occasion pour renouveler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les assurances de sa haute considération.

New York, le 1^{er} mai 2015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08

23 April 2015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the mandate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addition, I wish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all Member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dated 8 April 2015, inviting their Excellencies to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relevant records or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session, pursuant to the request set out in operative paragraph 2 of resolution 69/246 and by His Excellenc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verbale of 19 January 2015.

Further to that general request, and having now reviewed more closely the new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esently available to the Panel, the Panel notes that reference is made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the Commission),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to “a transcription of a what appears to be [‘UN diplomat’ George Ivan] Smith’s tape-recorded dictation of [French diplomat Claude] de Kemoularia’s account” of a claim by a former Belgian pilot named “Beukels” to have accidentally shot down the ‘Albertina’ (the aircraft in which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were travelling) in an attempt to divert it.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de Kemoularia and “Beukels” reportedly took place in Paris in 1967.

To enabl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is and other new inform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circumstances that resulted in the tragic deaths,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French authorities to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relating to that interaction and any other material referring to a Belgian pilot going by the name of “Beukels”.

Furthermore,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French authorities share with it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and past records and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custody or possession.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His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Fran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The Panel may be contacted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Government's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AUPRES DES NATIONS UNIES

L'Ambassadeu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New York, le 2 juin 2015

BC/ng

N° 2015 - 515 444

La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auprès des Nations unies présente ses compliments au Secrétariat du panel Dag Hammarskjöld et a l'honneur de se référer à la lettre, datée du 23 avril 2015, que vous m'avez adressée.

En réponse à cette lettre, la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auprès des Nations unies a l'honneur de faire valoir les éléments suivants :

Les recherches effectuées dans les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n'ont pas permis de trouver trace d'une conversation tenue entre M. Claude de Kemoularia et un pilote belge nommé « Beukels », relative à la mort de M. Dag Hammarskjöld. Les archives consultées sont publiques et non classifiées.

Comme il a été indiqué, la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auprès des Nations unies a accepté que les membres du panel consultent eux-mêmes ces archives in situ, si la demande en est faite.

En revanche et à la suite de démarches entreprises en France, il est apparu que, compte-tenu de l'âge et de l'état de santé de M. Claude de Kemoularia, celui-ci n'était pas en mesure de pouvoir répondre aux questions du Panel.

La Mission permanente de la France auprès des Nations unies saisit cette occasion pour renouveler au Secrétariat du panel Dag Hammarskjöld les assurances de sa haute considération.

François Delattre

Secrétariat des Nations Unies
Secrétariat du panel Dag Hammarskjöld

One Dag Hammarskjöld Plaza 245 East 47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NOFFICIAL TRANSLATION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Fran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presents its compliments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and has the honor to refer to the letter dated 23 April 2015 from the Head of the Panel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In response to the letter,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Fran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has the honor to submit the following elements:

Research in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ve not permitted to find trace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Claude Kemoularia and a Belgian pilot named "Beukels" concerning the death of Mr. Dag Hammarskjöld. Those archives are public and not classified.

As indicated,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Fran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ccepted for the panel members to consult these archives in situ, if requested.

However, after demarches accomplished in France, it appeared that, given the age and the current health status of Mr. Claude Kemoularia, he was not able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from the Panel.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Franc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vails it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he assurances of its highest consideration

François Delattre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06

23 April 2015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the mandate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addition, I wish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all Member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dated 8 April 2015, inviting their Excellencies to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relevant records or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session, pursuant to the request set out in operative paragraph 2 of resolution 69/246 and by His Excellenc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verbale of 19 January 2015.

Further to that general request, and having now reviewed the new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esently available to the Panel more closely, the Panel would like to add the following more specific request related to material potentially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its work. A German researcher has, following a review of academic archives in Germany, reported to the Panel that the West German intelligence agency,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ND), had established operations in the Congo in the summer of 1960 and was likely monitoring events of significance in the regio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crash of flight SE-BDY in Ndola, Northern Rhodesia (now Zambia),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In that connection, and to enable an accurate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deaths,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German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received through their agencies in the Congo o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ppearing to relate to the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his party.

Furthermore,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German authorities share with it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and past records and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custody or possession.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His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Germany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The Panel may be contacted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Government's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NEWYVN POL-1-1-VN Knorn, Till to: willis2@un.org

08/06/2015 12:41 PM

Cc: ".NEWYVN POL-AL-VN Schieb, Thomas"

History: This message has been replied to and forwarded.

I am referring to your Note Verbal from 23 April 2015 and ou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and would like to state, that Germany involved all relevant authorities, no relevant information has been found.

Best,

Till Knorn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07

23 April 2015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the mandate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addition, I wish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all Member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dated 8 April 2015, inviting their Excellencies to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relevant records or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session, pursuant to the request set out in operative paragraph 2 of resolution 69/246 and by His Excellenc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verbale of 19 January 2015.

Further to those general requests, and having now reviewed the new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esently available to the Panel more closely, the Panel would like to add the following more specific requests related to material of relevance to its work. Reference is made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the Commission),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to a file passed to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in July 1998, by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lating to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Chris Hani. That file reportedly contained documents referring to an operation codenamed 'Celeste' that,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s report, "...bore the letterhead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for Maritime Research [and] purported to report that a bomb planted on Hammarskjöld's aircraft had failed to explode on take-off from Leopoldville but had been activated before landing."

To enabl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is new informa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South African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records or other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documents referred to in the Commission's report, which the Commission advises may be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y references to the existence at the time in question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for Maritime Research; or any other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that either negates or corroborat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rted plan referred to in the Commission's report.

In addition, the Commission reported that a "former Katangan mercenary" named Colin

His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Cooper (nationality unspecified) alleged to the Norwegian police, in 2005, that a South African national by the name of Swanepoel told him during a stay in Elisabethville that Swanepoel, among others, had been posted in the bush to wait for Dag Hammarskjöld's plane and, once it had crashed, shot and killed a bodyguard who had survived the crash and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South African authorities to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relating to that claim, as well as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about the existence and activities of one or more South Africans working as mercenaries in Katanga in 1961 with the name Swanepoel.

Furthermore,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South African authorities to share with it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and past records and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custody or possession.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The Panel may be contacted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Government's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09

23 April 2015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the mandate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addition, I wish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all Member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dated 8 April 2015, inviting their Excellencies to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relevant records or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session, pursuant to the request set out in operative paragraph 2 of resolution 69/246 and by His Excellenc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verbale of 19 January 2015.

Further to those general requests, and having now reviewed the new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esently available to the Panel more closely, the Panel would like to add the following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ests related to material of relevance to its work.

The Panel has received a copy of a cable sent from the US embassy in Leopoldville (now Kinshasa) to Washington D.C., on 18 September 1961, reporting the “possibility [the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was shot down by the single pilot who has harassed UN operations and who has been identified by one usually reliable source as Vak Riesegehel [possibly a misspelling of Jan van Risseghem], Belgia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S authorities to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the Panel records or file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that include any response to the said cable, as well as any other material that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basis for the report, as well as any other reporting on the matter.

The Panel notes that reference is made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the Commission),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to claims made by a former United States Navy officer previously stationed at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s naval communications facility in Cyprus, Mr. Charles Southall, to have heard a recording of a radio communication in which an aircraft pilot reports attacking and downing another aircraft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the night the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crashed near Ndola,

Her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D.C.

Northern Rhodesia (now Zambia). Furthermore, the Panel has reviewed a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Sir Stephen Sedley, the Head of the Commission, with Mr. Southall, on 21 September 2012, tha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Commission's reporting on the matter. In that interview, Mr. Southall expresses the belief such a recording or a transcript thereof is likely stor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In its response to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quest submit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in connection with Mr. Southall's claim,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dvised, in a letter dated 20 August 2013, that two out of three documents found to be responsive to the request are exempt from disclosure to the Commission due to their classification as top secret. Similarly, media reports refer to a former US Air Force staff member, Mr. Paul Henry Abram, purportedly assigne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station in Iraklion, Greece, to monitor radio traffic who claims to have heard similar radio exchanges on the night in question.

In order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is new information, as it relates to efforts to ascertai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resulted in the tragic deaths,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S authorities to search their files for records or transcripts of radio traffic intercepted or received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concerning the landing or approach of an aircraft at Ndola, Northern Rhodesia, between 2130 GMT on 17 September 1961 and 0330 GMT on 18 September 1961, as well as potentially related records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ashington D.C. and the US embassies in Cyprus and Greece, respectively, around the time in question. Furthermore,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S authorities to disclose in whole or in part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documents referred to in the aforementioned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letter as responsive to the Commission's request.

Moreover, the Panel would welcome information about whether Mr. Southall and Mr. Abram were enlisted in the US Navy and Air Force, respectively, or other branches of the US Government at the time in question; stationed in Cyprus and Greece, respectively; and whether and in what capacity they worked in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t that time.

The Panel notes the Commission's reporting on the presence of two US Air Force aircraft, possibly DC-3 Dakotas, on the tarmac at Ndola airfield on the night of the crash, which Rhodesian Royal Air Force Squadron Leader Mussell reported to the UN inquiry of 1962 were "sitting on the airfield with their engines running". The latter observation was assessed at the time as inviting the possibility those on board were listening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in the area or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to another station or both. In assessing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is informa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S authorities to search their records for and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obtained or transmitted by those aboard the two US Air Force aircraft that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tragic crash of flight SE-BDY.

Reference is made in a Washington Post report, dated 3 June 1978, to an investigative article that refers to a purporte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report apparently submitted to President Kennedy in 1962 stating "There is evidence collected by our technical field operatives that the explosive device aboard the aircraft [flight SE-

BDY] was of a standard KGB incendiary design". The Panel would be most grateful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istence and basis of that alleged CIA report, or other CIA reports or related information it may have in its possession that would shed light on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crash of the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and his pa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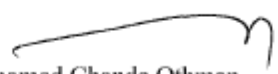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published in 20 September 1961 quotes former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as stating, "Dag Hammarskjöld was on the point of getting something done when they killed him. Notice that I said 'When they killed him'."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S authorities to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such as briefings to former President Truman that may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statement.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afore-mentioned searches include, where relevant,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files, including the relevan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and agency files; presidential library records, in particular those of Presidents Eisenhower, Hoover, Johnson, Kennedy and Truman; master schedules f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United States Congress records.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The Panel may be contacted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Government's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accept, Your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17

28 May 2015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the mandate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s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addition, I wish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Your Excellency, dated 23 April 2015, conveying several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ests relating to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agic deaths. Further to that letter, the Panel wishes to add the following requests regarding material relevant to its work.

In its ongoing review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he Panel has noted correspondence and other materials referring to the alleged involvement of a purported former-US Air Force and former-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mployee or contractor, Mr. Roland B. Culligan, in an aerial attack on flight SE-BDY, the aircraft carrying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his party, near Ndola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The materials describe a claim made by Mr. Culligan in an interview with an attorney, Mr. Jerome N. Frank, in the mid-1970s, that Mr. Culligan carried out the attack in a P-38 Lightning aircraft he flew from Tripoli (Libya) to Ndola, via Abidjan and Brazzaville. According to Mr. Culligan's account, the attack resulted in the downing of flight SE-BDY. The Panel understands that the claim was brought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Church Committee') in 1975.

In order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is new informa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U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relating to the claim. Moreover,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information about whether Mr. Culligan was enlisted in or contracted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r other branches of the US Government, at the time in question and whether he undertook activ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r other US Government agencies. In addition, information the US Government may have about whether Mr. Culligan possessed th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required to fly an aircraft on a mission of the nature he described would also be very welcome.

Her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In his book, 'True Men and Traitors: From the OSS to the CIA, My Life in the Shadows' (2004), author and purported former-CIA agent, David W. Doyle, writes that he observed the delivery of three Fouga Magister aircraft to the Katanga region by a US commercial KC-97 cargo aircraft in the period preceding the crash of flight SE-BDY. According to an interview of Mr. Charles Southall by members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Mr. Doyle later conveyed the same observations to Mr. Southall in a phone conversation in "the autumn of 2012".

To enable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is new informa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U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the Panel any information they have about the delivery of such aircraft to the Katanga region. In addition, the Panel would be grateful for information about whether Mr. Doyle was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r other US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agency and, if so, whether he was posted to the Congo or the surrounding region at or around the time in question.

The provision of such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before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relevant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The Panel may be contacted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12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Government's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accept, Your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799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 N.Y. 10017-3505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June 9, 2015

Dear Chief Justice Othman,

Dag Hammarskjöld was a peerless visionary and diplomat and a remarkable Secretary-General. His tragic death was a loss shared by the entir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s an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Ambassador Sison and I were pleased to meet with you on May 11, 2015, on behalf of Ambassador Power and the U.S. Government. As we discussed, we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dated April 8, 2015, regarding a general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and your letter of April 23, 2015, regarding several specific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We have also received your letter dated May 28, 2015 containing additional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We in the U.S. Government have done our best to be as responsive as possible to your requests.

In your letter of April 23, 2015, you noted that you had received a copy of a cable sent from the U.S. Embassy in Leopoldville to Washington, DC, on September 18, 1961 report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ircraft carrying Secretary-General Hammarskjöld was shot down by a Belgian pilot, identified by name, who had "harassed UN operations." You asked for records or files that include any response to this cable as well as any other material that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basis for the report, as well as any other reporting on the matter.

As Ambassador Sison informed you at our meeting on May 11, State Department searches have revealed a number of documents that are responsive to this request. Ambassador Sison was pleased to give copies of these documents – now de-classified – to you at our meeting on May 11.

Chief Justice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Page | 2

Your letter also makes reference to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and claims made by Mr. Charles Southall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head of the Commission that he heard a recording of a radio communication in which an aircraft pilot reports attacking and downing another aircraft on the night of September 17-18, 1961. Your letter notes that the Commission reported Mr. Southall's belief that such a recording or a transcript thereof is likely stor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Your letter notes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request, submit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NSA's response that two of the three documents found to be responsive to the request are exempt from disclosure because they are classified at the top secret level.

Your letter reques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earch its files for records or transcripts of radio traffic intercepted or received on the night of September 17-18, 1961, concerning the landing or approach of an aircraft at Ndola, Northern Rhodesia, between 2130 GMT on September 17, 1961, and 0330 GMT on September 18, 1961, as well as potentially related records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Embassies in Cyprus and Greece, respectively, around this time.

The United States has performed a search and has not found any documents matching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ocuments that you requested. This includes a search of NSA 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record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filed a FOIA request with the NSA for radio intercepts as described in your letter, but also asked for "any reports, memoranda or other correspondence about the airplane that carried" Dag Hammarskjöl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in its response, interpreted the request broadly, stating "We have interpreted it broadly in order to enable a more thorough search." Under this broad interpretation, the NSA said that it had found responsive documents, but that they remained top secret and could not be disclosed. The documents are not transcripts of recordings of a purported radio communication in which an aircraft pilot reports attacking and downing another aircraft on the night of September 17-18, 1961,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any such transcript.

You requested that the US disclose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documents. Under a special arrangement, Ms. Kerry Macaulay, a member of the Panel, was permitted to read copies of these two NSA documents on a confidential basis. These were copies of the same two NSA documents which were identified by NSA in response to the FOIA request. We hope that Ms. Macaulay's review of these two documents will enable the Panel to conclude that they do not contain information which would shed light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Dag Hammarskjöld's death.

You requested information about whether Mr. Southall and Mr. Abram were enlisted in the Navy and Air Force, respectively, or other branches of the US Government at the time in question, stationed in Cyprus and Greece, respectively, and whether and in what capacity they worked in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t that time. With respect to Mr. Southall, as Ambassador Sison stated during our meeting on May 11, we have received information that indicates that he joined the Navy in 1955 and was released from active duty in 1969, and that he retired from the Naval Reserve in 1978 at the rank of commander. We have requeste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search for information responsive to your other questions regarding Mr. Southall, and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Mr. Abram.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two U.S. Air Force aircraft at Ndola airfield on the night of the crash, we have requeste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search for information responsive to this query.

Regarding the purported CIA report referenc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on June 3, 1978, we have sough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at purported report, including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ut the CIA has found no such report or any record of such a report. We have specifically ask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John F. Kennedy Library whether they have this purported report, and they informed us that they searched their files and also have no record of such a report.

Regarding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quoting Harry S. Truman, we have contacted the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Truman Library representatives informed us that they have searched their files and have found nothing that sheds light on the basis for his alleged comment. They told us that they have no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that was communicated to President Truman by President Kennedy or by any other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U.S. Government has not found anything which would shed light on the basis for his alleged comment.

The JFK Library provided us with a link to some documents which are in their online library which relate to the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We have shared this link with your sta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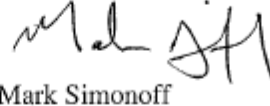
Regarding your May 28 letter, the CIA reviewed its records documenting CIA activities during the time in question and found no reference to Mr. Culligan. Likewise, the CIA has conducted a search and has found no documents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Fouga Magister aircraft in the Katanga region around the time in question. In addition, neither the CIA nor the

Page | 4

NSA found responsive information to the requests contained in your letters of April 8 and April 23 of 2015.

I hope that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to the Panel has been of assistance to you.

Sincerely,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Mark Simonoff', written over the printed name.

Mark Simonoff
Minister Counsellor
Leg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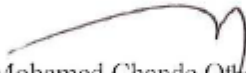
REFERENCE: 2015-DHP-005

23 April 2015

Excellency,

Further to our meeting with you on 20 April 2015,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letter to Dr. Cornelia Sorabji of today's date requesting certain specific information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National Archives or other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agency files, as applicable. The Panel would be most grateful if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would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o support the Panel's request.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s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His Excellenc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IP-003

23 April 2015

Dear Madam,

I am writ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of which I am the Head. That Panel, which consists also of Ms. Kerryn Macaulay and Mr. Henrik Larsen, is mandated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nel's work, I am kindly requesting a search of all relevant archives and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including national agency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archives and records, for any pertinent, as yet unrelea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tragic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Furthermore, the Panel presently has information that, in order to assess its probative value, warrants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ests. Reference is made in that regard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the Commission),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to the prese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alleged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agent, Neil Ritchie, operating in and around Ndola over the period the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crashed. A declassified report from Mr. Ritchie details how, on 17 September, he transported the self-appointed President of Katanga, Moïse Tshombe, and the British Counsel in Katanga, Denzil Dunnett, to Ndola, whereupon they then awaited the arrival from Leopoldvill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While that particular report does not comment on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ragic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the Panel believes it likely that subsequent reporting by Mr. Ritchie or other MI6 personnel present in the area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hereto. In that connec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report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from Mr. Ritchie or other intelligence officials with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and any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In addition, an academic researcher has informed the Panel about the presence in the

Dr. Cornelia Sorabji
United Kingdom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London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of retained portions of several files of interest and possible relevance to the Panel's assessment. These are as follows:

- a. FCO 371/161548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UN Secretary General – 1962
- b. FCO 371/161549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 c. FO 371/155003 - Activities of mercenaries in Belgian Congo - 1961
- d. FO 371/155015 - Air traffic to and from Belgian Congo – 1961
- e. FO 371/161551 - Supply of aircraft for Katanga - 1962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hare the retained portions of those records with it, as well as any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or past records and other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custody or possession.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You or your staff may contact myself or other members of the Panel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at regard, the Panel would gladly receive information as it becomes available, as opposed to in a consolidated form.

Please accept, Madam,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10

27 April 2015

Dear Sir,

I am writ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of which I am the Head. That Panel, which consists also of Ms. Kerry Macaulay and Mr. Henrik Larsen, is mandated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nel's work, I am kindly requesting a search of all relevant archives and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including national agency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archives and records, for any pertinent, as yet unrelea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tragic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Furthermore, the Panel presently has information that, in order to assess its probative value, warrants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ests. Reference is made in that regard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the Commission),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to the prese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alleged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agent, Neil Ritchie, operating in and around Ndola over the period the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crashed. A declassified report from Mr. Ritchie details how, on 17 September, he transported the self-appointed President of Katanga, Moïse Tshombe, and the British Counsel in Katanga, Denzil Dunnett, to Ndola, whereupon they then awaited the arrival from Leopoldvill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While that particular report does not comment on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ragic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the Panel believes it likely that subsequent reporting by Mr. Ritchie or other MI6 personnel present in the area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hereto. In that connec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report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from Mr. Ritchie or other intelligence officials with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and any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In addition, an academic researcher has informed the Panel about the presence in the

Mr. Robert Deane
United Kingdom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London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of retained portions of several files of interest and possible relevance to the Panel's assessment. These are as foll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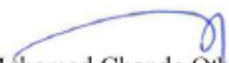
- a. FCO 371/161548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UN Secretary General – 1962
- b. FCO 371/161549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 c. FO 371/155003 - Activities of mercenaries in Belgian Congo - 1961
- d. FO 371/155015 - Air traffic to and from Belgian Congo – 1961
- e. FO 371/161551 - Supply of aircraft for Katanga - 1962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hare the retained portions of those records with it, as well as any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or past records and other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custody or possession.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You or your staff may contact myself or other members of the Panel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at regard, the Panel would gladly receive information as it becomes available, as opposed to in a consolidated form.

Please accept, Sir,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11

27 April 2015

Dear Sir,

I am writ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of which I am the Head. That Panel, which consists also of Ms. Kerry Macaulay and Mr. Henrik Larsen, is mandated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nel's work, I am kindly requesting a search of all relevant archives and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including national agency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archives and records, for any pertinent, as yet unrelea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tragic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Furthermore, the Panel presently has information that, in order to assess its probative value, warrants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ests. Reference is made in that regard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the Commission),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to the prese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alleged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agent, Neil Ritchie, operating in and around Ndola over the period the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crashed. A declassified report from Mr. Ritchie details how, on 17 September, he transported the self-appointed President of Katanga, Moïse Tshombe, and the British Counsel in Katanga, Denzil Dunnett, to Ndola, whereupon they then awaited the arrival from Leopoldvill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While that particular report does not comment on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ragic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the Panel believes it likely that subsequent reporting by Mr. Ritchie or other MI6 personnel present in the area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hereto. In that connec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report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from Mr. Ritchie or other intelligence officials with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and any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In addition, an academic researcher has informed the Panel about the presence in the

Mr. Martin Tucker
United Kingdom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London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of retained portions of several files of interest and possible relevance to the Panel's assessment. These are as follows:

- a. FCO 371/161548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UN Secretary General – 1962
- b. FCO 371/161549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 c. FO 371/155003 - Activities of mercenaries in Belgian Congo - 1961
- d. FO 371/155015 - Air traffic to and from Belgian Congo – 1961
- e. FO 371/161551 - Supply of aircraft for Katanga - 1962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hare the retained portions of those records with it, as well as any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or past records and other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custody or possession.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You or your staff may contact myself or other members of the Panel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at regard, the Panel would gladly receive information as it becomes available, as opposed to in a consolidated form.

Please accept, Sir,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REFERENCE: 2015-DHP-012

27 April 2015

Dear Sir,

I am writ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ependent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9/246 of 29 December 2014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of which I am the Head. That Panel, which consists also of Ms. Kerry Macaulay and Mr. Henrik Larsen, is mandated to examine and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tragic death of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nel's work, I am kindly requesting a search of all relevant archives and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including national agency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archives and records, for any pertinent, as yet unrelea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tragic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Furthermore, the Panel presently has information that, in order to assess its probative value, warrants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requests. Reference is made in that regard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of 2013 (the Commission), in its report dated 9 September 2013 (A/68/800), to the presence and activities of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alleged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agent, Neil Ritchie, operating in and around Ndola over the period the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crashed. A declassified report from Mr. Ritchie details how, on 17 September, he transported the self-appointed President of Katanga, Moïse Tshombe, and the British Counsel in Katanga, Denzil Dunnott, to Ndola, whereupon they then awaited the arrival from Leopoldvill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While that particular report does not comment on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ragic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the Panel believes it likely that subsequent reporting by Mr. Ritchie or other MI6 personnel present in the area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hereto. In that connection,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earch for and share with it any report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from Mr. Ritchie or other intelligence officials with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deaths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the members of his party, and any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In addition, an academic researcher has informed the Panel about the presence in the

Mr. Patrick Salmon
United Kingdom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London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of retained portions of several files of interest and possible relevance to the Panel's assessment. These are as foll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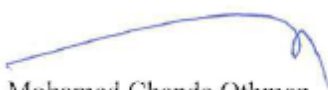
- a. FCO 371/161548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UN Secretary General – 1962
- b. FCO 371/161549 – Enquiry into circumstances of crash of aircraft carrying Dag Hammarskjöld
- c. FO 371/155003 - Activities of mercenaries in Belgian Congo - 1961
- d. FO 371/155015 - Air traffic to and from Belgian Congo – 1961
- e. FO 371/161551 - Supply of aircraft for Katanga - 1962

The Panel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e competent UK authorities share the retained portions of those records with it, as well as any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including indexes of relevant materials, current or past records and other classified materials they may have in their custody or possession.

The provision of any su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ould greatly assist the Panel's efforts to assess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In light of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was no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in his Not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68/800), we hope that any such documents can now be declassified,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shared with the Panel.

You or your staff may contact myself or other members of the Panel through the Secretary to the Panel, Mr. Matthew Willis, who can be reached via email or telephone at willis2@un.org or +1-917-367-4907, respectively. The Panel notes it is required to report the findings of its assessmen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by 7 June 2015 and would accordingly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at regard, the Panel would gladly receive information as it becomes available, as opposed to in a consolidated form.

Please accept, Sir,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Mr Mohamed Chande Othman
Head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by e-mail

Head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al Records Officer

Tel: 0207 008 1118
Fax:
www.fco.gov.uk

10 June 2015

Dear Mr Chande

DAG HAMMARSKJÖLD PANEL

Please accept my apologies once again that I was not able to provide you with a substantive response to your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within the original timescale given in your letter of 27 April.

You asked us to search across all relevant archives and records in the UK for any pertinent, as yet unrelea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tragic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an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accompanying him. You also asked us to share with the Panel the retained portions of files held by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CO).

The vast majority of UK material relating to these events has already been releas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Kew and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here. The FCO has co-ordinated a search across all relevant UK departments. None of these departments have identified any pertinent material.

I have also commissioned a review of all the retained material listed in your lett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material can now be released. This review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that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released to the Panel unless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withhold it.

I regret that our review has determined that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release any of the retained material. We have reviewed all of the individual redactions and we have concluded that this information must continue to be withheld under Section 3(4) of the UK Public Records Act. In all cases the reason for these redactions is that the information cannot be released for security-related reasons.

The redactions consist of individual pieces of text, within otherwise open files. We are not retaining any whole documents or files. The tot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withheld is very small and most of the redactions only consist of a few words. The limited nature of these redactions can be seen in the files which are openly available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Our assessment is that all information of value to the Panel has already been releas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the files you have identified and that release of the redacted material would not provide anything of additional value for the Panel's work.

Yours sincerely,


R. DORRIS

Head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al Records Officer